



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2185号。这是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砖木结构民居，建筑面积197平方米，原为江岸分工会秘密办公地。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时，遭到军阀的干涉和破坏，2万多名工人决定举行总同盟大罢工。同时，总工会自2月3日起由郑州迁到汉口江岸分工会办公。张特立（张国焘）、李震瀛、陈潭秋、林育南、项德隆（项英）、杨德甫、施洋、林祥谦等曾在此开会，起草宣言、电稿，编写宣传品，一时间这里成为领导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斗争的指挥部。2月4日上午，林祥谦在这里下达了罢工命令，随着汽笛拉响，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了。2月7日，罢工斗争遭到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

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见证了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也见证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残酷镇压，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

1956年11月，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被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对旧址进行修缮，1981年2月7日正式开放。

（图、文由武汉二七纪念馆提供）

目录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陈邈馨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陈 光 朱向梅
杨 华 李修文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 鹏 甘 琼 龙桃仙 吕照清
刘重武 陆建军 陈立新 郑学军
姚四平 曾艳红 谢受贵 窦 梅
潘红莲

主 编：陈国方

副 主 编：周 敏

本期责任编辑：周 敏

编 辑：华 蕾 张川蕾
游 迎

封面设计：王 鹏

红色印记

<<< <

4 三块怀表的记忆 / 章 兰

文化遗产

<<< <

7 执心著“木”雕刻人生
——武汉木雕传承人邓道航口述实录
/ 邓道航(口述) 马翠翠 刘 恋(整理)

商聚汉皋

<<< <

11 行者无疆初心在 / 俞 卫
15 我和吉安商会的那些事 / 巫世峰

精工匠心

<<< <

19 毫发技艺 顶上功夫 / 岳汉桥(口述) 白爱萍(整理)

山有黄门

<<< <

23 回忆创建华中数控的岁月 / 杨克冲
28 20 世纪 80 年代在珞珈山看电影、听讲座 / 陈东华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CONTENTS

2021 年第 3 期 (总第 341 期)

委员天地

<<<< <

33 华中国际车展按下武汉会展的重启键 / 张 琚

36 我的教育之路 / 张际爱

往事漫忆

<<<< <

40 回眸建国初期的武汉二中 / 巴忠人

44 我的学徒生涯 / 肖人杰

人物春秋

<<<< <

50 爱国学者徐行可与教坛名师刘凤章 / 刘松余

都市史话

<<<< <

55 江城古桥面面观 / 李庆南

楚风汉韵

<<<< <

60 江夏龙泉山名人印记 / 涂明星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7

(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三块怀表的记忆

◇ 章 兰

30年前，我刚刚来到武汉二七纪念馆工作，在全面熟悉“二七”史实的过程中，听前辈们讲述了很多馆藏文物背后的故事。我记忆深刻的是馆里珍藏着的三块怀表，这三块怀表虽外观老旧，但正面、背面仍可见其产地和年代的字样。一馆三表，承载着“二七”那一段段真实而厚重的历史，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到那风雨如磐的历史岁月。

史力亚烈士的怀表

在武汉二七纪念馆，珍藏着全国铁路总工会早期领导人之一——史力亚烈士生前使用过的一块怀表。

怀表系铜质，通长9.5厘米，通宽6.5厘米，通高2厘米，链长39厘米，重0.198千克。1896年产于瑞士。

据怀表的捐赠者凌必应1974年捐赠怀表时回忆：1922年，当史力亚同志从苏联回国后，党派他到开封陇海铁路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发动工作，传播马列主义思想。

在他的领导下，陇海铁路成立了总工会。1923年2月1日，史力亚和凌必应同志作为陇海铁路总工会的代表，出席了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当大会遭到反动军阀吴佩孚及其爪牙的破坏后，党组织当晚决定：总工会迁移至汉口江岸办公。史力亚和总工会负责人先一步前往武汉。临走时，史力亚将他的怀表送给了凌必应同志留作纪念。随后党组织又派凌必应连夜赶往江岸分工会，做安徽工人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团结起来和敌人进行斗争。

凌必应（1893年9月20日～1988年7月30日），安徽省巢县人，出生在散兵镇一个工人家庭，是二七大罢工领导人，新中国人民币的缔造者之一。1921年以前，在京汉铁路江岸大厂和河南易县广玉公司煤窑做工时就领头与资本家进行斗争。1921年起开始革命生涯，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活动，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陇海铁路全路大罢工。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河南省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1923



史力亚烈士的怀表

年组织建立陇海铁路总工会，任会长，代表陇海铁路参加了著名的二七大罢工。1925年组织建立党的陇海铁路秘密交通大队，任队长，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继续坚持斗争，并代表河南省参加了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加入张学良下属部队，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浴血沙场。他还将杨靖宇等青年共产党人介绍到东北工作，从而促成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1938年到达延安，任延安工科大学总务科长。1948年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凌必应与董必武、聂荣臻、薄一波、徐向前、滕代远、黄敬、谢觉哉、范文澜、成仿吾、杨秀峰、宋劭文、南汉宸、戎伍胜（戎子和）、张苏、陈瑾昆、蓝公武、于力、邢肇棠、薛迅、殷希彭、赵尔陆、贾心斋、晁哲甫、刘雨辰、徐正、王复初等27人成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组成了代表279个县、12个市、4500万华北解放区人民的华北人民政府。1949年全国解放后，成为新中国人民币的缔造者之一，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印

刷一局局长、北京人民印刷厂（国营541厂）总工程师、北京人民印刷厂副厂长、北京人民印刷厂技术顾问，是一个一生崇尚技术、工具从不离手的人。

1927年4月2日，史力亚同志在南京被敌人杀害。凌必应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携带着这块史力亚送给他的怀表。为了纪念参加过二七革命斗争的烈士，1974年10月，凌必应同志将这块怀表捐献给武汉二七纪念馆。1995年，这块怀表被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它见证了我党早期革命工作者为追求真理前赴后继、勇于斗争、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林祥谦烈士的怀表

在武汉二七纪念馆，还陈列着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的遗物——一块圆形的怀表，它是林祥谦烈士生前从事工人运动的见证。怀表系铜质，瓷表盘，通长4.5厘米，通宽4.5厘米，通高1.8厘米，重0.085千克。瓷表盘芯文字为瑞士生产的罗斯科波夫品牌，表盖还注有日内瓦1896年生产、货号435193等文字，保存基本完整。这块怀表，为林祥谦烈士提供了准确的时间，让工人黄正兴于2月4日9时拉响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第一声汽笛。它蕴含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发展高潮——二七大罢工的这段历史，铭刻了中国共产党牺牲的第一位革命烈士、工人运动领袖林祥谦为了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宁死不屈、壮烈牺牲的生命轨迹。

1912年，林祥谦到汉口江岸机厂当了机器钳工。作为工人中的一员，林祥谦总是关心工友们，慷慨相助，所以在工人中威信很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汉口江岸是铁路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武汉地区党的负责人陈潭秋等同志常到这里发动工人，结识了林祥谦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工人，推荐他们看《工人周刊》《劳动周刊》《工人的胜利》等书刊。在江岸劳动补习学校（夜校），他们经常向林祥谦等人宣传新思想、新道理，宣传成立工人俱乐部的意义。在这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林祥谦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从一个穷苦的、受欺凌的工人，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22年，林祥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祥谦经常和工友说：“咱们工人都是被踩在脚下的受苦人，要翻身就必须不分天南地北联合起来。”经过他的广泛发动、积极串联，1922年1月22日，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在江岸刘家庙老君殿成立，林祥谦被选为俱乐部的财务干事。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遭到军警的阻挠和破坏。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线总同盟大罢工，林祥谦负责领导江岸地区的罢工斗争。

按照总工会统一部署，4日上午9时是江岸开始罢工的时间。林祥谦用这块怀表，准确无误地指挥拉响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第一声汽笛，全路的客、货、军用列车一律停驶，长达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顿时瘫痪。这次罢工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2月7日，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罢工实行了血腥镇压。军警将林祥谦逮捕后，绑在江岸车站的电线杆上，刽子手逼迫他下令复工，他坚贞不屈，坚毅地回答：“头可断，血可流，工不能上！”从容就义，时年31岁。

林祥谦是在党领导的第一次全国工人

运动高潮中，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壮烈牺牲的优秀共产党员，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大公无私、勇于献身的崇高品质，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树立了光辉榜样。

何树林的怀表

由于铁路运输对时间的准确度要求极高，为保证运输安全，钟表是当年铁路职工最重要的必备工具之一，也是1923年那个特殊年代铁路工人有组织、守纪律组织革命斗争的历史见证。在武汉二七纪念馆，有一块名为“有喊”的怀表，是二七老工人何树林老人1973年捐献给二七纪念馆的。

何树林，生于1901年，湖北应山县人，二七时期在郑州机车厂任镶配工，工会小组长；解放后在江岸机务段任机车钳工。1973年，他将这块怀表捐给二七纪念馆，当时接收经办的是纪念馆接待室主任杨汉荣。

何树林老人1921~1936年是郑州机车厂工人。那个时候，计时的钟表是珍贵稀罕物品，佩戴怀表是作为一名铁路工人身份的象征，也是工作需要。何树林老人将怀表像军功章一样挂在胸前，朝夕相伴不离。怀表伴随着老人几度风雨，几经周转，在铁路工作一生。

三块怀表三段不同的经历，铭刻着先辈那深深的永不褪变的初心。打开怀表，我们穿越时空隧道，感受到林祥谦等先烈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浓浓的阶级感情，感受到先辈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前仆后继、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

（章兰：武汉二七纪念馆接待部部长）

执心著“木” 雕刻人生

——武汉木雕传承人邓道航口述实录

◇ 邓道航（口述） 马翠翠 刘 恋（整理）

结缘“木雕”

1938年农历九月十九，我出生于湖北武汉，是家里的老幺。父亲给我起名“道航”，取“观音得道，借舟航行”之意。

1958年，我考入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但因哥哥患黄疸病无人照顾而被迫辍学。那张录取通知书留了一辈子，都变黄了，一直到现在我都留恋。哥哥病情好转后，我决定去找一个谋生的职业。当时湖北省“布衣省长”张体学重视工艺美术，投资建设国营百花工艺雕刻厂，把全省优秀的老艺人召集起来，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也给很多年轻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我的老同学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后，我决定带着自

己曾经的画作毛遂自荐。那时，厂长从我的画里看出我很有悟性，就把我分配给著名木雕老艺人梅海清当学徒。就这样，我和武汉木雕结下不解之缘。

梅师父是武汉木雕的第三代传人，木雕技艺精湛，授徒循循善诱，为人谦逊和善。他告诫我要博采众老艺人之长，在生活上也对我百般照顾。我生第一个孩子时，他怕我抱着累，还给我买了一个背篓，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在传统的师徒制下，事师之犹事父也，护徒之犹护子也，师徒之间超越了简单的授受关系。1961年，学徒期满后，我开始独立创作并收徒。我对师父充满感恩，也把这种传统延续下去。

我将近60年的木雕创作生涯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60年代，我的代表作较少，那时主要跟着老艺人做神像。神像神态平静，没有复杂的动势，只追求大的轮廓效果，雕刻起来比较简单。1961年，自己的处女作《和平万岁》在国内工艺行业打响后，我开始在木雕界小有名气。“文化大革命”波及木雕行业，其后周总理提出内外有别，不讲封资修，木雕艺术创作才不至于被中断。“文化大革命”后期，随着政治环境不断宽松，木雕行业也渐渐恢复生机。我的创作更加自由，那时创作了一批作品，以观音像和美女像为主。

改革开放后，厂里外贸业务扩展。在外贸业务科长的启发下，我首创大型组雕，并在广交会中央大厅展览。所谓组雕，就是表现内容广泛、气势雄伟宏大的大型木雕，它由各个独立的部件组装而成，也可任意拆卸。在20世纪80年代，我一共创作了7件大型组雕，分别是《神曲》《楚乐图》《龙拉车》《凤拉车》《群仙祝寿》《楚辞·云中君》《端阳龙舟》，这些鸿篇巨制集中展

示了荆楚地域文化，远销各国，为企业创汇良多。

1991年，我因为腱鞘炎提前两年退休。回家后，我的创作没有止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琢磨作品。我退休后的作品鲜有宏大的场面，多是人物形象的细部刻画和神韵展现。眼神、手部成为我关注的重点，因此局部的人物雕像也成为这一时期的创作重点。我热爱木雕，学到老、活到老、钻研到老，它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终生事业。

守正创新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刘锡诚先生认为，文化传承“不是单线的延长或原质的移位，而是既有衰减又有增量，以创新达成文化的积累。积累是传承的结果，而积累的核心是传承者的创新”。我继承了武汉木雕的传统，同时希望通过积极创新，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为传统木雕开辟新领域。

（一）守章法创新法

传统武汉木雕在技法上讲究慢雕细琢，沿用“一打三修”的操作方法，刀法上采用“打、劈、剔、修、光”等，讲究“三庭五眼”“立七、坐五、盘三半”的人物形象比例，注重“文要雅、武要威、女要秀”的传神表现，构图要求“花无正果，热闹为先”，追求画面饱满……

我在践行传统木雕技法的同时，在汉阳文化宫免费学习素描、白描，良好的绘画功底为构图和打粗坯提供了基础。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仅在整体



武汉木雕传承人邓道航，2008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湖北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比例上是和谐的，而且在细节上也经得起推敲。1977年12月，我向同事借阅了《美国应用人体解剖》一书，花了半年时间手抄全书，并用多色笔绘制了人体肌肉图。有了解剖学基础，我在雕刻人物木雕像的肌肉时更加有灵感，打磨得更加科学和细腻。在《花季》中，我参考陈逸飞的画作来塑造16岁女孩的手，并将其柔润化。在《陈伯华》中，我对面部肌肉尤其是额肌、颧肌、眼睑等都做了精细的刻画。在《布袋罗汉》中，我根据人体不同部位肌肉的不同特点，把罗汉面部、胸部和腹部处理得富有弹性、吹弹可破。

（二）偏爱女性形象

传统武汉木雕以金漆、彩漆神像见长，我在神像木雕的基础上，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和擅长领域。

我的作品中女性形象居多，并且赋予不同身份的女性风格各异的表现力。女娲补天时的波澜壮阔，白蛇为救丈夫盗仙草时的勇敢无畏，传统社会知识女性的温婉端庄……我希望赋予仙、妖、人不同的魅力，但她们都是朴实庄重的，妖娆而不妖艳。我对于像女娲、昭君、红线等女性英雄形象具有无限的崇敬之情，这些女性打破传统观念的禁锢，勇敢地为国、为家作出牺牲，彰显了女性的价值。

我还关注异域女性，曾创作阿拉伯妇女、巴西姑娘、美国演员泰勒的木雕……但我视《圣母》为最神圣的作品，从不参展和出售。我家住在教堂附近，母亲信仰基督教。听母亲说，我小时候在教堂受洗，牧师称上帝会为我赐福。受到母亲的影响，我从小崇敬耶稣和圣母，因此创作了这一作品。

（三）荆楚韵味浓厚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武汉南北文化交融，但也有着浓郁的楚汉风味。我热爱家

乡地域文化，作品中有厚重的楚文化色彩。楚人信巫鬼、重淫祀，作品《楚辞·云中君》根据屈原《九歌》构思，表现久旱之年楚人祭虹祈雨时，云神（虹神）呼风唤雨，众人跳弓腰舞酬谢神灵的场面。楚人多行大义，作品《王昭君》中昭君身披毛皮裘衣、手抱琵琶，坚定地选择出塞和亲，使汉匈免于干戈。楚人有乐舞传统，楚王好细腰，长袖舞是古代楚王最喜爱的宫廷宴乐舞蹈。作品《编钟乐舞》和《长袖娇魂》刻画了长袖细腰跳舞的女子，线条流动，活灵活现。另外，楚纹样在楚文化作品中随处可见，是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

（四）关注民间传统

古老的神话传说故事体现了民众对于生活的朴素认知，寄托着对于祖先的感恩，对和谐、幸福、善良的追求。我经常从中寻找创作灵感，希望通过朴实亲民的作品，表达民间的美好愿望。我对传统年画《年年有鱼》进行改造，作品中的娃娃脚踩虎头鞋，头梳发髻儿，手抱一条大鱼，老少都很喜爱。神话传说故事是时间艺术，木雕则是空间印象。如何将这种空间时间化？这些故事式作品多把“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通过某个单一场景表现出来，以暗示出事件的前因后果，从而让观者在意识中完成一个叙事过程。我通过刻画最耐人寻味、最容易激发想象力的“片刻”，激活集体记忆，来彰显民间文化的巨大感染力。

文化担当

早年由于家庭变故，我失去了读书的机会。那时我很迷茫，无法适应新的身份变化。进入木雕行业后，我希望自己尽快从挫折中走出来。当时工厂里的很多员工害怕辛

苦，不愿意多花时间，最后半途而废。我觉得人应该自觉自律，干一行就要爱一行。我不甘心一直模仿老艺人的作品、做复制的工具、做一名普通的匠人，所以自觉在艺术上积极探索，为每件作品注入思想和灵魂。

那时，我立志要做一个求上进的人。高中文化水平的我热爱并且有能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学习与木雕相关的知识，并在其中寻找创作的素材和灵感。我喜欢观察生活，紧跟时尚潮流，创作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作品。我的审美观是朴实庄重、崇敬英雄。我对自己严格要求，作品中那些英雄式的女性就是我的榜样，她们拥有才识、本领和远大的抱负。我希望像这些女英雄一样，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立身之本，寻找生命的意义。

在社会有立足之地，就一定要有奉献精神。在工厂时，我经常加班，却很少拿奖金，但我没有怨言。我觉得应该奉献，一个人一辈子，要有自己的足迹、自己的贡献。

做木雕这么多年，我在木雕这一行业中不断摸索，找到自己的专长，将木雕作为终生的事业，我觉得特别值得。因为自己快活，别人认可，雅俗共赏，何尝不快活。我工作的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正是木雕行业最为景气的时候，我的作品多由外贸通过广交会出口，为企业创汇，也曾作为展品、礼品，还屡次获奖。我担任过第四届湖北省政协委员，两次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这些都是荣誉，都是因为我无私奉献得到的荣誉。木雕上的成绩让我从失学的阴影中走出来，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主体的身份认同。正如《第二性》所说：“当她成为生产性的、主动的人时，她会重新获得超越性；她会通过设计具体地去肯定她的主体地位；她会去尝试认识与她

所追求的目标、与她所拥有的金钱和权利相关的责任。”我虽然是一名女性，但是在木雕行业中，我和其他男同胞一样，拥有同样的资源，只要积极付出、甘于奉献，就能平等地获得荣誉和报酬。

2018年，我很荣幸被评为武汉木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新的身份赋予我新的责任。我觉得自己不仅要教徒授业，还要肩负起传播优秀文化的责任。现代化的社会不应该丢弃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老艺人伏案孜孜以求的精神品格值得我们代代延续。孙正国、熊浚在《乡贤文化视角下非遗传承人的多维谱系论》中提出传承人要有文化担当，认为“文化担当的内涵就是这个传统中接受主体的自觉文化行为，积极参与传统文化实践的过程中，非常乐意去学习传统文化的代表形式，以内在的认同情感去传播自己的文化，担当着文化使者的重要职能”。我也一直在努力承担自己的文化责任，做好传播武汉木雕、荆楚文化的使者，把老艺人的精湛技艺教给更多喜爱这行的学生、把楚文化的韵味传播给更多的朋友。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希望永葆对于木雕的热爱，甘心奉献、心无旁骛，不遗余力地教徒授业，当好民间文化传承发展的脊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出一份力。

（邓道航：武汉木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马翠翠：华中师范大学非遗研究中心研究生；刘恋：武汉市江岸区图书馆副馆长）

行者无疆初心在

◇ 俞卫

走南闯北，行业内外小有名气

1968年，我出生在江苏南通通州三余镇。在南通一带，“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的思想在那个年代根深蒂固。对一个人来说，学会一门技术、一项手艺，是顶要紧的。初中刚毕业，我就开始学习电工，跟随乡里建筑站去了上海。那年，我17岁。

跟随师傅学习技术本领，有了一定基础后，我开始承包一些工程自己干。大约在1986年，我就当上了小老板。

由于我勤于学习，精于钻研，很快在同业者中崭露头角，并于1991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机。那年初夏，我收拾好行装，一路北上去了首都北京，成为上海汇丽集团北京分公司的一名职员。上海汇丽集团是1973年成立的一家老国企，是专业生产、

销售各类涂料、地板、木制品、PC板材、幕墙、门窗等产品及工程施工的综合性建材企业。当时，我负责建材销售和工程管理。

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接触到的人层次都比较高，看到的、学到的东西很多，眼界也变得更广了。我很快适应了北京的市场，通过不断积累，夯实基础，提高业务水平。四年之后，北京分公司的领导鼓励我出去闯一闯，同意并支持我到其他城市开设分公司。我选择了武汉。

当时，上海汇丽集团在全国已有100多家分公司，在武汉也已有两家分公司，分别在武昌和汉口，我灵机一动：“新公司就叫作‘汉阳’吧。”于是成立了集团在武汉的第三家分公司——汉阳分公司。

我们公司出售的建材俏得很，都是全国知名品牌，要排队才能买得到。我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建筑设计院和大型国有建



武汉市南通商会会长俞卫（左一）作2019年商会工作报告

筑公司，都是很牛的单位，比如中建三局、武汉建筑设计院、中南建筑设计院等等，那时候民营企业很少，民营的建筑装饰公司也不多。

从上海到北京再到武汉，商者无域，行者无疆，我懂得，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才能干出成绩。

灵活变通，带领企业转型升级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还有些计划经济的色彩，直至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期，计划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开始全面推行市场经济。这10年，是我砥砺奋进的10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我由一个国有企业分公司的负责人，成为一家民营企业的小老板，带领一帮小兄弟，走遍了武汉的大街小巷，紧跟着武汉的改革开放，见证了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那时候，大批的建材企业、建材品牌和建材产品开始涌现，供需关系发生了改变，建材行业和建材产品销售竞争压力开始显现。而随着房地产的改革，房屋装饰装修行业开始兴起。2006年，我看准了，

随着住房私有化和人们对居住标准、要求的不断提高，房屋装修行业成为了热门行业，并由依附于建筑行业的一个分支，逐渐脱离母体，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及时决定转行，退出销售市场，改行装饰装修，成立了武汉汇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又是一个10年，也是风云激荡的10年。我赶上了装饰行业蓬勃发展的好时期，无论是产业发展的变革，还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居住环境和公共环境的要求有了提升，我的建筑装修公司风生水起、从小到大，见证着武汉住房改革和人民群众居住条件的不断提高。10年之中，民营装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装饰行业也开始进入了竞争激烈的膨胀期。2016年，我又一次决定转型，逐步缩小装饰装修的业务份额，转向市政交通设施工程，以期抓住武汉城市建设和改造带来的发展机遇。

我深知，干哪一行都会有风险，每次转型调整都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当老板，操的心就要多，压力也更大。我也曾因为经验不足吃过亏，但总体上采取了边做边转的战略，基本上实现了平稳过渡。

供需关系的改变，经济体制的改变，产业结构的改变……无论是哪一种，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的带头人，应该深谙其变革之道，并及时调整企业发展方向，灵活调度，懂得取舍。“做成百年企业，是每一位企业家的愿景，但是百年老字号毕竟是少数，企

业有自己的生命周期，5~8年，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甚至还没有这么长，所以只有不断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具备适应生命周期的能力，才能突破生命周期的限制，走得更久更远。”对此，我深有体会。

团结奋进，扛起商会发展大旗

2021年，已经是我在武汉发展的第25个年头，对武汉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对家乡南通的了解。每每回乡探亲或者考察，我都不禁感叹既熟悉又陌生，童年记忆中的青石小巷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摩天大厦和四通八达的高架，家乡的发展变化着实太大太快了。南通这几年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区位优势不断凸显，承南启北、西进东出、辐射内陆的气象也已初步形成。

武汉的地理优势更不用说，九省通衢，对周边有很好的辐射带动作用。我们的生意也是立足武汉，向周边省市延伸。广大通商在江汉平原奋斗打拼的故事，被写进了城市发展的历程，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我经常细细地琢磨，一批批通商在两地比翼发展的大环境下，怎么样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南通籍企业家的优势和作用，进一步推动武汉和南通两地的合作交流。

早在10年前，我就加入了湖北省江苏商会，担任常务副会长，商会组织中亦有不少南通籍企业家，他们相互帮助、相互

扶持、团结发展、无私奉献，无论是在市场上，还是在社会上，都获得了广泛赞誉，大大提升了通商在湖北、武汉的公信力。

10年之中，我认真履职，笃实力行，成为湖北、江苏两省和武汉、南通两市的联络员，被组织授予“十佳副会长”称号。2018年春节期间，我创建武汉市南通商会的想法得到了武汉广大南通籍企业家的拥护和武汉、南通两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关心。在当年5月的成立大会上，我被委以重任，担任商会第一任会长，扛起了商会建设和发展的旗帜。

“参天大树，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老乡之情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就要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企业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大家联合起来，这股力量就是无穷的。”在成立大会上，我要求全体会员牢固



2020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7个“扶贫日”，武汉市南通商会会长俞卫（右一）代表商会，到蔡甸区消泗乡杨庄村开展“两帮两助”扶贫慰问活动

树立团队意识，并制定了建设一个民主、和谐、阳光商会的目标。

成立两年，商会工作初显成效

目前，在武汉市的南通籍企业有300多家，南通籍人士达6万多人。人数众多，涉业广泛，商会平台效应很快在武汉传播，加入商会成了在武汉的南通籍企业家共同的心声和愿望。

武汉市南通商会成立两年多来，以创建“四好”商会为抓手，推进商会全面建设，制定了12项规章制度和6个岗位职责，研究通过了《南通商会2020～2024年五年战略发展规划》。商会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为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奠定了基础。

我们商会成立之时，就建立了商会党支部，以党建促会建，加强政治引领，树立大局意识，使商会领导班子真正做到思想上合心、工作上合力、行动上合拍，形成一盘棋、拧成一股绳，确保商会工作不偏航、不越轨、不翻车。

树立商会品牌、提高商会知名度，成为大家不懈奋斗的共同目标。为了进一步做好商会工作，秘书处建立了武汉市南通商会官网，开辟了商会动态、党建工作、政策法规、通商资讯等8大栏目，形成信息传播的平台和文化宣传的阵地。商会在新闻媒体宣传了18个先进通商企业和优秀民营企业，展示了通商风采。

这两年，商会成功组织了建筑、餐饮、工业、商贸、科技、五金机电、家纺等14次行业发展座谈研讨会，推进会员企业加快发展。南通《通商》杂志专门为商会开设了“一月一座”专栏，推进会员企业加快发展。由于在政治引领、规范管理、发挥作用、履

行责任等方面工作富有成效，2019年，我们商会被评为武汉市工商联评为武汉市“四好”商会；2019～2020年，被武汉市工商联推荐为湖北省“四好”商会。

2020年，我们商会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齐心聚力、众志成城，投身到武汉疫情防控阻击战，参加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会员企业共捐赠爱心专款1300多万元，各种物资价值50多万元；商会企业花山月酒店被武汉市政府征用，圆满完成了中交二航局91名技术人员和江苏无锡、河南新乡、山西太原3支援汉医疗队310名医务人员的后勤保障任务。为此，商会被评为武汉市社团组织抗击疫情先进单位，被湖北省工商联授予全国楚商企业积极贡献奖。

武汉雄踞长江中游，南通扼守长江入海口，长江把两座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学无涯、思无域、行无疆，我坚信广大通商定能在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展现新作为、再创新辉煌。

（俞卫：江苏南通人，江苏万虹达交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市南通商会会长，湖北省江苏商会常务副会长）

我和吉安商会的那些事

◇ 巫世峰

我叫巫世峰，是民建武汉市洪山区工委会员、中乾立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武汉吉安商会会长。2017年，我和吉安籍老乡们自愿发起并成立了武汉吉安商会，大家一致推选我做了会长。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说我自己以及商会的那些故事。

（一）

1974年，我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那时候家境贫寒，全家每年收入仅能维持温饱，所以很早我就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的命运仿佛就注定了一生只能依靠自己，我也更早地懂得了“努力”二字的深刻含义。

1998年，我从武汉理工大学毕业，对

知识仍有迫切的渴求。但考虑到经济压力，我不得不放弃深造，进入武汉理工大学研究设计院，从事项目管理工作。当时我有很多的职业选择。一家香港公司相中了勤快肯干的我，开出了3500元的月薪。这在当时是很高的工资水平了。但我在考察中发现，这家企业不鼓励员工持续学习与进修，不利于个人发展。因此，我果断放弃了这份高薪工作，选择进入月薪仅为300元的武汉理工大学研究设计院，就为了就近“寻师”学知识。

这种放弃短期利益的“吃亏”做法，在现在看来是极具眼光的决定。从1999年到2008年，我从普通员工做到了总经理，负责公司的全面管理，专业技术和管理能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此期间，我完成了武汉理工大学结构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学习，并取得了学位证书。

在这最初的10年职场生涯中，我也曾与人合伙开公司，但由于经营理念的分歧，在维持了4年时间后，我选择拆伙，退出股份，也放弃应得的140万元项目提成。看似“吃亏”的行为，却成就了良好的个人口碑，为企业后来的创业征途奠定了基础。

机会总是宠信有准备的人。201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家建筑咨询公司的老板找到我，希望我出资收购企业。我在仔细考察后，果断出资300万元收购了这家企业，并将其改名为中乾立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简称中乾立源），开始了个人独自打拼的时代。

中乾立源主营业务为工程招标代理、造价咨询和工程咨询，业务范围涵盖工程建设、市政、园林、装饰工程、土地整理等的招标与采购。没有人员，没有业绩，中乾立源该如何闯市场？但这个行业有个好处，不需要有很多资金，不需要很大的成本，只要市场认可你，就能找到业务做。

在行业里沉淀了十多年，我踏实做事的品格与专业素养，在业内赢得了不错的口碑。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二十多年前实习时的业主，如今也成了我的业务伙伴。就这样，不少人听到我创业，都想帮一把，给予了我一些尝试的机会。而我也依靠专业能力把握住了这些机会，慢慢在业内积累了客户，干出了一番事业。

拳拳赤子心，殷殷桑梓情。我自万安县乡村一路走来，深知农村贫困学生的困苦。创业成功后的我，内心时常牵挂着家乡的孩子们。2015年始，我倡导公司与母校万安中学签订了“十年助学”计划，每年资助50名左右贫困学生，每个学生给予2000元的助学金。对于成绩优秀考取大学的还将继续开展“大学圆梦”助学。我总说：“企

业光赚钱没有多大意义，要值钱！要社会尊重你！而这种尊重就来源于你对社会的奉献。”多年来，我在做企业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将爱心奉献给社会，捐资助学、助困，带领员工走进全国50多所乡村学校，资助了近500名学子。

尊老敬老仁之本，和谐社会孝为先。我在关注贫困学生的同时也记挂着孤寡老人。2019年4月28日上午，武汉吉安商会组织会员走访慰问洪山社会福利院，给老人们送去了洗发水、牙膏、沐浴露、洗手液等日用品。大家一起实地查看了福利院老人的居住、生活环境，并与老人们叙叙家常、唠唠嗑，有的老人看到我们情不自禁地留下眼泪，他们是太想念家人，太孤单了。我们作为“子女”一定要常回家看看。

（二）

吉安商会从成立开始，就制定了会长轮值走访制度。由轮值会长带领有时间的会员一起走访我们的会员企业，拜访吉安籍在汉的乡贤企业。大家坐下来，交流一下做企业的心得、经验，增加会员之间的了解，叙一叙乡情，增进兄弟们的感情。“我们做企业一定要诚信经营，遵纪守法，企业做稳，才能睡得着觉。我们不做赚钱的企业，要做值钱的企业。要社会对你尊重，而这种尊重就来源于你对社会的奉献。这就是价值观。”不管是在会长办公会上还是会员走访座谈会上，我每次都要和会员们强调这个观念，因为这是我们做人、做企业最基本的东西。每次走访结束，老乡们都要热情地安排聚餐。但我认为，我们成立商会的初衷，是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是凑在一起吃吃喝喝，那不是商会是老乡会。为此，

我经常强调：“我们走访，大家是来互相学习、互相了解的，不能给老乡们增添负担。有合作意向的会员企业，下来后再了解再沟通，老乡帮老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抱团取暖，共同壮大。有了能力，我们一起回报社会，反哺家乡。”我是这样要求会员们，自己更是这样做的。

商会成立后，我们能做些什么，怎样才能团结会员，凝

聚会员们的力量呢？我只要闲下来就思索这个问题。一开始，大家集思广益说在南湖弄个餐馆。门面都看了，我也找了专业的设计师设计了图纸，结果却不了了之了。后来又有会员提出来要一起做饭店，专门做江西菜。我说好，既然说做这次一定要做成，不管有多少会员参加，剩下的资金由我和庄远明会长兜底。就这样说干就干，由十几名会员参股东筹了江西餐厅。我们从选门面到装修两个多月完成。经营中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没有正式开业。但是在店长（商会刘外姣副会长）的努力下，基本上扛过来了，没有亏，这真心不容易。我们经营这家餐厅是带着使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赣菜，宣传庐陵，宣传我们庐陵的美食文化。因为我们武汉吉安商会的会员都是充满家乡情怀的人。

2020年6月13日，洪山区域商会组织了主题为“树牢非公理想信念，打赢脱贫攻坚战战役”的献爱心活动，走进新洲区旧街姚



2020年2月初，巫世峰（右）及夫人许明莹在雷神山医院物资捐赠现场

河村开展对口扶贫。姚河村是贫困村，茶叶是村里的主导产业，种植面积2000多亩，年产量2万多斤。但由于疫情的影响，当年村里的茶叶滞销，销售量只有往年的四成。我们商会十几家会员企业自愿报名参加了消费扶贫，大家购买了茶叶、农户散养的土鸡蛋和农民自家种的蔬菜。农民准备了很多蔬菜，每一袋里面有土豆、豆角、黄瓜等，一袋10元，大家纷纷购买。结束时，我看见老乡的车上还有不少打包好的蔬菜，我想蔬菜不能久放，这么多他们又吃不完，于是跟我们江西餐厅的负责人说：“把蔬菜都带回店里吧。”虽然我们餐厅也用不了这么多青菜，但是不能让老乡们吃亏。我和会员们说：“帮助贫困地区脱贫、打好脱贫攻坚战是我们企业共同的目标任务，非公经济人士也要有信念有信心，把协助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己任，携手齐心攻克难关、战胜疫情，扶贫攻坚行在路上，尽心尽力。”

(三)

2020年新年伊始，中华民族共同经历着一场大考，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中国人民的心。我想，只要心手相牵，就没有跨不过的坎。

记得武汉封城的前一天，我彻夜难眠，毅然放弃了回万安老家过年的计划，决定留在武汉。我想，此时第二故乡更需要我和我的家人朋友微小的支持。于是，武汉封城第一天的清晨，我第一时间携夫人许明莹一同前往武汉市慈善总会，以公司名义捐赠现金10万元。

从那天起，我就和公司员工以及商会会员们一直奋战在防疫一线，为了疫情所需，通宵未眠是经常的事。我与公司党支部、妇联、工会负责人联系，组织公司员工捐款捐物，发动商会会员和公司员工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得知家乡江西援鄂医疗队到达武汉的消息，我立刻请战：家乡医疗队的后勤保障我们来！为了守护这些可敬可爱的白衣天使，我带着会员多方采购医护人员所需的生活物资，尽最大努力满足他们的各项需求。我想：医护人员守护患者，我们守护他们！疫情面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感谢所有的医护人员敞开胸襟，去温暖需要帮助的人。

2月1日，江西省万安县慈善总会收到了捐赠倡议发出后的第一笔捐款10万元。捐款来自中乾立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和中晟地理信息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的负责人都是我。这也算是我对家乡万安县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吧。

有人问我捐款的初衷，我说：“我听到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就把钱转过去了。为

什么要做第一个？因为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人带头，有人做了，其他人就会跟着一起做。”我始终相信，善良的举动只要开始了，大家便会前赴后继，终成大爱。所以，在疫情发生的时候，我在率先向武汉市慈善总会捐赠10万元用于购买防疫物资的同时，联系、组织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江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亚洲电器电缆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援助武汉雷神山医院7380件价值300万元的东鹏洁具、100万元的电线电缆等物资。在我的带动下，武汉及各地吉安籍企业家纷纷向家乡和武汉捐款捐物，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截至4月8日，我公司累计组织向江西吉安、武汉等地现金捐款近50万元，组织捐赠物资价值416万余元，商会组织分七批次向武汉捐赠186吨有机蔬菜，向江西援汉医疗队捐赠紧急物资和生活用品价值近10万元。

我总是想：我们现在的成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因为社会给予了我们机会和帮助；作为一个企业负责人，应该要有这份社会责任感，回报社会是一个企业家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

（巫世峰：江西吉安人，中乾立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吉安商会会长）

毫发技艺 顶上功夫

◇ 岳汉桥（口述） 白爱萍（整理）

我叫岳汉桥，是湖北卡丽诗美发美容培训中心艺术总监、高级技师，先后获得湖北省首席技师、武汉市技能大师、武汉“大城工匠”等称号。

30多年来不断钻研，我将“毫发技艺”玩出了“顶上功夫”，成就了自己，也带出了一批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队选手。

（一）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伢。1966年1月30日，我出生于一个美发世家。父亲从事了一辈子的美发师工作，很是宠爱我这个独子，工作时也总是把我带在身边。可以说，我是在美发店长大的，理发师手中的剪刀是我看得最多的东西。

高中毕业后，我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通过招考参加工作。当时的服务业，最好的工作是进入照相馆，其次是旅社，再后才是理发店和浴池。以成绩而论，

我本可以进入旅社，可是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美发。可能是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吧，美发早已融入了我的骨血，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我拿起剪刀时，感觉马上就来了，看来我注定了要从事这一行。从学徒做起，我开始了一点一滴的积累。师傅剪发，我就站在一旁认真观察、仔细琢磨，在脑子里默默模仿师傅的动作和手法，并抓住一切机会上手操作，苦练理发技能。很快我便能独自上手了，一个个漂亮清爽的发型在手中慢慢成形，我觉得成就感满满。

1985年，在武汉理发界，我“小荷才露尖尖角”，开始参加省里和市里的比赛，以赛练技。1990年，我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那年我去上海参加商业部组织的全国大赛，一举获得银奖。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奖，从此我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作为湖北省第二个拿到全国大奖的发型师，我受到了各级领导和同

行们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又激励了我的上进心。我像一棵把根深深扎在土里的小树，不断汲取养分，更加勤奋地打磨技艺、不断创新，以期来年的枝繁叶茂。很快，我又获得了湖北省“新长征突击手”“技术能手”等称号，一些省、市领导和演艺界知名人士开始纷纷找我理发、做造型。那个时候，我每周都要去电视台，给多部影视剧和电视栏目的影视人和主持人做头发造型。可以说，我的美发技术引领了武汉时尚界的潮流，很多人以成为我的顾客为荣。

（二）

1993年，我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个转折。

一天，湖北省委组织部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想不想去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那边缺造型师。说实话，我有点犹豫，以我的技术和名气，当时正是赚钱的黄金时期。可我的母亲不这样看，母亲认为党培养了我，现在党和祖国需要，就是我的光荣，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就这样，在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下，我来到了香港，成为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名理发师。

在那个年代，香港自带光环，而在新华社工作，在大家的眼里更是高不可攀。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够进入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着实让不少人感到惊诧。有人问我是不是走了后门，纷纷猜测我有强大的背景，还有人断言我在香港呆不了多久。可实际上，从1993年到2000年，我在香港一干就是六年半，创下了同行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年限的最高纪录。

无他，精湛的美发技能和成熟的政治品格就是我的“关系”和“后台”，也是我的底气。

在香港这个现代化、开放性的国际大舞台上，我的眼界和思维一下子打开了，美发在我的眼里，不再仅仅是“剃头”，而是实现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在香港工作期间，我认识了很多国内外知名的美发大师，接触到了许多在家乡接触不到的国外原版专业书籍，我把大部分工资都用在了购买美发方面的专业书上，如饥似渴地一头扎入美发知识的海洋，不知疲倦地吸收、充实、完善自我。

还是在香港，在那个特殊的岗位上，我日臻成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美发师，我还亲历了香港回归前后的惊心动魄，又有幸参与了“九七回归”大型活动，负责接待中央政府代表团。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下榻酒店期间，我一直陪伴一旁，服务左右。

1997年7月1日中午，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返京前的百忙之中，和工作人员合影留念，我位列其中，这是我永生难忘的时刻。

（三）

我始终认为，艺术是相通的。从生活中、从其他门类的艺术中，美发可以找到很多灵感，比如黄金比例、时空感、色彩的搭配及层次等，因此，作为一个有追求的美发师，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理发”，必须要广泛地吸收各门类的知识，并坚持不懈地积累和创新，触类旁通、厚积薄发，用眼睛去发现美，用双手去创造美、传播美。

为了避免美发学习者走弯路，从香港回汉后，2002年，我在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批准下，开办了湖北卡丽诗美发美容培训中心，进行高品质、高品位的科学、系统的美发教学。

培训中心约 400 平方米，规模不大，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实行小班教学。从此，我把培养美发技能人才作为人生追求，开启了诲人不倦的育人模式，对学员倾囊相授，很快这个学校便在业内声名鹊起、好评如潮，千里万里之遥，都有人慕名来我这里学习。2014 年，我的工作室获评“湖北省技能大师工作室”；同年，我帮助武汉市第一商业学校创办了美发专业。

依托培训中心和大师工作室及其他渠道，我前后带徒 10 万余人，武汉三镇、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都有我的爱徒，不少人快速成长为美发技术能手，在各类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陈广飞，出身贫寒家庭，我免除了他的全部学费，手把手地传授技艺，之后他在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湖北选拔赛中获美发项目第一名，在国家队选拔赛中获第五名，进入国家集训队，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和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朱红，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湖北选拔赛中美发项目亚军，在国家队选拔赛中获第八名，也进入国家集训队，获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皮佳杉，转行师从我学美发，短短时间内成长为武汉市“美发技能状元”，获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

在育才的同时，我也没有放弃对自身技艺的打磨和追求。2012 年，我将传统技艺“手指造型”发扬光大，不需化学烫发，仅通过针梳和手指配合，将头发做成饼圈、立圈、筒圈，有序排列，风干后稍加整理，就形成大小波浪和浪花发型，获批“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 年，我从毛留、密度、长度等方面反复试验，对来源于西欧的头模进行技术改良，提高了头模教学训练的针对性；2016 年，我改良打薄剪，将剪除率从 40% 降至 10%，成为市场主流产品；



2020 年，岳汉桥荣获第三届武汉“大城工匠”称号

2019 年，我利用卡纸发明了四种剪发层次结构变化的教具，帮助发型师理解头发的落差对发型重量的控制，提高了培训质量，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教具成本；我还率先提出了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发型设计理念，开发了“二分区坐标定位精致剪烫”“九个基本发型经典剪裁”，主编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美发师》、“十三五”规划教材《盘发造型》等多本经典教材。

在此基础上，我博采众才，不断推陈出新，以扎实过硬的技艺做底，将各种时尚的元素一一拈来，精心排列组合，呈现出色彩绚丽、造型大胆、想象丰富、充满动感的美发作品，在各级美发大赛中或亲身参赛、斩金夺银，或担任专家组组长、教练、裁判。2003 年，我被劳动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授予“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美发）命题专

家”；2005年，中国美发美容协会授予我“中国美发大师”称号；2012年，在OMC世界美发大赛（日本）上，我获女士创意发型冠军，同年在OMC世界杯发型化妆大赛（意大利）上受聘为国际裁判；2014年，在第十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上，我受聘为裁判长；2018年，湖北省人社厅授予我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湖北省选拔赛“优秀教练”称号，同年我还成为第四届中国国际接发艺术大赛总评判长；2019年，武汉市人社局聘请我为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专家组长；2020年12月，我国举办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我担任裁判员，并获“优秀裁判员”称号……

这一清单如果一个不漏地逐一列举出来，会很长很长，它见证了我一路走来的坚实步伐。

（四）

人自有情怀和态度。我是一名党员，身上佩戴的党徽既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使命。我认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要把自己放在大我的环境里去思考，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胸怀、有什么样的热情，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作为，做人做事都是这样。

2020年年初，武汉遭遇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纷纷逆行援汉抗疫。看着电视上播出的医护人员为了便于穿防护服而选择把头发剃光的新闻后，我坐不住了；而微信朋友圈里不时发出的想理发的心声，也让我呆在家里静不下心来。我萌生了组建理发志愿服务队的想法。号召一出，很多理发师朋友响应，很快我便组建了一支由30多名成员组成的“爱心义剪”

志愿队，并在武汉市总工会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走进医院和社区开展义剪活动。

3月15日一大早，我带着义剪队来到了火神山医院，二话不说抓紧时间开剪。当天，我们为200余位医护人员理了发，结束后手酸得差点连剪子都举不起来。临离开时，有医护人员问我以后还来吗，希望我们能再来一次，我很肯定地微笑着对他们说：“我们的志愿服务将一直持续到疫情结束。”

3月18日，我和4名队员走进青山区青源社区，服务下沉社区干部及工作人员。

“谢谢你们，这发型很漂亮，感觉整个人都轻松多了！”“没想到疫情期间还能享受省技能大师给我们剪头发，真的很惊喜。”剪完头发的社区工作人员及下沉干部无不称赞我们的精湛技艺。

疫情期间，我和“爱心义剪”志愿服务队共计深入火神山医院、金银潭医院、同济医院、协和医院、市中心医院、江汉方舱医院及社区，为医护人员、下沉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义务理发8000余人次；同时我还受湖北省人社厅湖北工匠平台邀请，通过斗鱼等网络平台，在线传授美发技艺，录播、直播近50个课时；并自行开发在线课程，通过钉钉等平台 and 湖北电视台等媒体，免费系统教授美发知识，教居民自助理发。2020年，湖北省人社厅授予我“湖北省线上职业技能培训专家”称号。

我一直认为，工匠精神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不懈地努力、执着地追求，缘于热爱，成于坚持，精于执着。

我经常以鲁迅先生的名言教导学生：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在我看来，这条路就是勤奋、专注、奉献，这条路就是成功之路。

一路匠心，我终不负光阴。

回忆创建华中数控的岁月

◇ 杨克冲

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中数控）是华中科技大学校办产业，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的上市公司。华中数控生产中高档数控系统、工业机器人、交流伺服电机及伺服驱动系统等产品，是我国中高档数控系统的领军企业。华中数控已经成为我国民族数控产业的一块品牌。本文回忆的是公司创建及发展前期我经历的一些事。

科研成果的转化

1986年5月，我出任学校机械一系副主任，分管全系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华工，老校长朱九思重视科学研究，在全国高校首屈一指。他认为通过科研提高教师水平是第一要务。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的提速，在每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都会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一些科研攻关课题，并拨出专题科研经费。我校的机

械工程专业在全国高校及机械行业中小有名气，因此每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总是可以申请到大大小小的一些课题。与此同时，大的厂矿为发展需要，也会提出一些攻关课题。我的工作是：1. 争课题。与教师一起到各部委、厂矿企业游说，争取拿到课题并立项；2. 负责课题的管理，按进度督促完成；3. 结题。项目完成后组织鉴定会，课题交差。为做好课题结题，我们非常重视鉴定会。会前需做好文献检索，确定成果是国内领先还是国际水平。有些成果，还要申请实用新型专利或发明专利。再就是发表文章，课题也就到此为止。年年如此，循环不息。此后的职称提升、工资、分房也都与成果或获奖挂钩。但人们常把科研成果的鉴定会比喻为“追悼会”。我在任八年，深感许多成果束之高阁，非常痛惜。因此让科研成果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贡献被提上议事日程。

20世纪90年代，校领导提出教学、科

研与产业三足鼎立的办学方针，此时学校出现了一些公司，如高理电器公司、图像公司等，华中数控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诞生的。

华中数控公司的筹建

1994年3月，学校批准成立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周济出任院长，我任党总支书记。我们在讨论科研与产业时，规划当时最有希望的三个产业：1. 数控（机床数字控制系统的简称）；2. 机械CAD软件（CAD即计算机辅助设计），即现在的上市公司“天喻信息”；3. 开目CAD，即现在的上市公司“华工科技”的一部分。从国家的急需出发，我们把重点放在数控上，决定将隶属学校的数控工程中心、机械系的数控教研室和CAD中心的数控编程小组整合，成立数控公司。人员则以自愿为原则。现在华中数控公司的总工程师朱志红教授就是当时数控教研室教师，他的科研成果是基于工业控制机的铣削机床数控系统软件；现在的公司副总熊清平教授是数控工程中心的教师，他的科研成果是数控车削软件；CAD中心的周云飞教授的成果是快速算法。

20世纪中后期，数控机床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普及。当时我国也制造数控机床，但数控系统几乎全靠进口。德国西门子公司、日本法那科公司的数控系统独霸了我国市场，但卖给我们的也仅限于三轴联动以下的系统。

1983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东芝事件。日本东芝公司卖给苏联五轴联动数控铣床，用于加工螺旋桨，迅速提高了螺旋桨的加工精度，使苏联潜艇的噪声减少90%。美国第一次丧失对苏联潜艇的水声探测优势。按巴黎统筹委员会（下称“巴统”）的规定：

三轴联动以上的数控铣床属战略物资，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因此，日本东芝公司受到“巴统”的严厉惩罚。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将数控系统的研发列入攻关课题。然而攻关的结果不理想，业内人士称之为“累战累败，累败累战”，数控系统攻关受挫。北京机床研究所花巨资购买日本专利，然而他们卖给我们的却是老的、过时的技术，紧接着日本又推出新的产品，结果还是被动挨打。华中数控的员工深知，我们研发与创建的数控产业是在捍卫民族利益，是在打破“巴统”禁运与制裁。

在数控技术的发展进程中，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研制专用芯片，用作数控系统的核心。它要求有强大的技术队伍、先进的设备和巨大的资金投入。另一条路线是用PC机（个人计算机或称微机）作为数控系统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PC机的性能已发展到很高水平，可满足机床数控系统核心部件的要求；而且PC机的生产批量很大，软件资源丰富，价格便宜，可靠性高，数控系统从此进入基于PC机的阶段。我校机械系数控教研室朱志红教授等人开发了一套基于工业控制机的数控系统，我们正是应用这一成果，成立了公司。

公司的发展策略

办产业首先要解决资金。我们将公司定为股份公司，学校以科研成果参股，是最大股东。周济通过老同学的关系，找到香港华润参股，解决了部分资金。为鼓励创业人员，调动其积极性，在学校的股份中拨出10%分给个人。

20世纪末期，国内已有不少大小各异

的生产数控机床的厂家，它们大都采用国外的数控系统，我们暂时难与之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提出的发展策略是“让开大道，占领两厢”。所谓大道是指生产数控机床、采用进口数控系统的大厂。我们暂时让开，既暂不进入，也难以进入。所谓两厢，一厢是指教学数控机床。当时我国数控机床的操作人员与编程人员奇缺，以至数控机床、数控设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我们把开发和生产教学数控机床作为一厢。我们还编写、出版了与教学数控机床相适应的教材，供中技、中专及职业学院使用。与此同时，还为使用设备的学校培训师资，甚至授课。另一厢是旧机床的数控改造。数量达几百万台的旧机床仅能手工操作，我们对其进行精化，并做数控改造。上述两厢自然用的是华中数控生产的数控系统。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的系统逐步为市场所接受，从让开大道到进军大道，使华中数控的数控系统在中国市场有了一席之地。

2005年以后，我们与大连机床集团的合作，以及与桂林机床厂合作生产五轴联动数控铣床，都标志着我们进入了大道。这时，外国公司的策略是：只要中国能生产的系统，他们的同类系统就大幅降价。例如五轴联动的数控系统（这是“巴统”禁运与限制的产品）从百万元降至几十万元，企图以此来扼杀国产系统。华中数控经历多年的拼搏，产品更加成熟，生产规模也逐步扩大，已经可以与国外系统抗衡。

华中科技工业园的初建与公司的搬迁

1998年，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决定在汤逊湖畔的庙山扩建开发区，资助我校及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在此建立科技

工业园，给每所学校建园资助2000万元。我校科技工业园的面积约为1400亩（包括300亩湖面），两边分别是武汉大学科技工业园和武汉理工大学科技工业园。

我校科技工业园就在当年动工兴建。学校决定校园内的公司都必须搬迁入园。这时华中数控公司已成立四年，初具规模。但来访客户的第一印象是学校办的公司就如家庭作坊，产品不正规，往往难以接受。正值此时，公司从国家科技部得到1000万元的科研经费，遂决定在科技园建厂。因此，华中数控成为科技工业园的第一个入园企业。

当时我是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负责建厂工作。我第一次来到庙山，踏勘征地范围，心生疑虑。虽说已征地，但农民还未拆迁，到处是农舍、农田、菜地、坟地，荆棘丛生，我心想何年何月能建成？那时交通也极不方便，只有一班从武昌到纸坊的班车，在校门口（即关山口）有一站可以经过庙山开发区。就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产业集团很快租了农民的房子，开始挂牌办公，王延觉副校长披挂上阵，出任华工科技工业园的总经理。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也派了蒋总坐镇，处理征地中的问题。我们公司的陈吉红总经理准备买200亩地，因地价便宜，从农民手里征地，每亩只要3.5万元。万万没想到后来每亩变为12万元，陈总只好作罢，只买了约70亩。由于华中数控是第一家入园企业，优惠条件是在1000多亩地中任选一块。我们选中了现在的位置，门面开阔，又靠近交通线。

严把工程质量 厉行勤俭建厂

在华工科技园的建设过程中，华中数控勤俭建厂经常受到称赞。2000年，我年

事已高，不再担任公司的副总经理，改任公司高级顾问。此时我与陆云祥副总经理共同负责建厂。

我从教40年，现在转为办企业，犹如秀才下海，一肚子的书生气，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建厂属工程建设，我和陆总拿着图纸和建厂申请报告去跑审批。从开始申请到审批完成要盖几十个图章。一位行家告诉我们，最好准备一辆车，当你办完手续后，汽车轮胎也就磨损得差不多了。幸运的是，办事人员看到我们两位老人，给我们面子，办得比较顺利。当时我们想到公司的事业，想到要举起民族数控的大旗，要冲破“巴统”的禁运和制裁，所有这一切也就一步步跨过来了。

华中数控的厂房设计由长沙的第八设计院承担。要保证工程质量，首要的是保证设计的质量。1999年，我与陆总10次到长沙的八院，及时解决设计中的问题。

2000年初春，工程开工。我们要建的是一栋5000多平方米的四层研发大楼，一栋3000多平方米的电气装配车间，一栋2000多平方米的机械车间。对于施工单位的选择，我们的宗旨是既要保证施工质量，又要造价最低。通过工程的投标，我们选中了中建五局。从2000年到2001年的两年中，我都是在庙山工地度过的，早出晚归，寒来暑往，头戴安全帽，天天在工地上、脚手架上，与工程监理检查工程质量，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工人都误认为这老头是监理。那时我已经65岁。

工程虽已开工，但我与陆总心里总念着一盘经：公司只有1000万元专款，其余都是生产流动资金。既要保证工程质量，又得少花钱，我们都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用。举两个例子：研发大楼需购买一部电梯，这

是公司的门面，要买名牌。但我们只买一台，很难得到厂家的优惠。我们得知学校西边建高层住宅，拟购奥的斯电梯，便立即找到学校设备处，订货时多加了一台。因为是批量订货，获得了最优惠的价格。另一件事是工程供电需要两台干湿变压器，我们得知顺德变压器厂生产的产品质量最好，但在武汉订货价格怎么都降不下来，我就在春节后工厂上班的第一天跑到厂里订货。广东人都讲究开门红，厂方因此给予特殊的九折优惠。

有些设备委托施工方购买，对方报出的价格，陆总也不轻言允诺，必须经过市场调查，才予以报账。

在施工中还有一个小插曲。2000年的春天，春雨绵绵，下了近一个月，严重影响工程进度，大家都很着急。中建五局的钱总在工地边建了一座关帝庙，早晚敬香，没想到很快天晴了。当然这是迷信，天总是要晴的，但这也说明我们当时的心情。

从设计到工程完工，历经三年，三座建筑终于屹立于华工科技园广场的右侧。在施工的两年时间里，既无质量事故，也无安全事故，工程顺利完工。2001年10月，华工数控新厂落成，周济校长陪同科技部领导前来剪彩。

在科技园上班的日子

2001年8月已经完成建厂。三年的寒来暑往，特别是在工地的两年，实在太累，我便借到加拿大看望女儿，做些休整。10月份回国，偶遇周济校长，他头一句话是：“杨老师，你为数控盖了那么漂亮的厂房，应有成就感，何时回数控上班？”校长的盛情难却，我只得又到科技园上班。这时公司却陷入资金困境。建厂花了2400多万元，

生产用的流动资金全贴上了，此时连发工资都困难。陈吉红董事长拟从银行贷款，银行先是不贷，后是要担保，学校产业集团怕担担子，不愿作保。

可喜的是，新基地的研发与生产条件已今非昔比。孙逸华总经理领导的销售团队，李小华副总经理的生产团队都投入拼搏。生产采购的压力最大，因为公司必须维持生产，但没有资金采购原材料，他们就用赊购的方法，产品卖出去了回笼资金后还款。公司的员工团结一心共渡难关。新的生产基地为公司带来新的活力，公司绝处逢生。

公司迁入科技园后，我又工作了四年。我坐镇培训部，继续开发教学数控机床。恰逢此时，职业教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先后到武汉第四机床厂、扬州机床厂、绍兴通力机床厂、黄山机床厂、荆州机床厂、武汉机床厂等单位，与厂方技术人员共商数控机床教学，组织公司技术人员完成和出版了《数控机床实验指南》《数控机床电气控制》《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等教材。这里要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支持，教材始终以华中数控的系统为主线，既解决了许多学校的教材困难，又宣传了公司的产品。

2005年10月，我即将步入70岁之时，决定离开公司，移居加拿大，与女儿团聚。

后记

如今，我离开公司已经10年，在这10年中，公司有了更大的发展。

2010年，公司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利用这一融资平台，公司进行两次资产重组。第一次是收购华大电机。华大电机的高性能交流伺服电机与公司生产的交流伺服

驱动系统配套，进一步开拓了这方面的市场。2015年又实现了第二次资产重组，以2.8亿元收购锦明机械，壮大了公司工业机器人的开发与生产能力。

在机床数控系统方面，公司已经生产三轴以上联动的数控系统。“巴统”的限制与禁运已成历史。

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陆总又负责在原有70亩未用完的土地上，盖了一栋更为宏伟的研发与生产大楼。

在公司发展的历程中，始终得到领导的关怀。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吴邦国考察武汉，在华中数控参观时说：“我分管工业时，曾到沈阳机床集团考察，看到用的几乎全是国外系统，我问能否研发自己的系统，他们说可以，但要多少投资，我当时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你们在国家没出钱的情况下就实现了。”一席话给了华中数控员工莫大的鼓舞。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国家教育部原部长、现工程院院长周济，更是始终如一关心支持华中数控的发展。

我与现任公司董事长陈吉红共事多年。1995年，公司成立不久，困难重重，急需一位得力的领导。周济与我商量，决定调陈吉红出任公司总经理。他临危受命，至今已20年。陈吉红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思路开阔，带领公司员工为华中数控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展望华中数控，前程似锦！

（杨克冲：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教授，华中数控公司创建人之一。本文2015年10月写于加拿大多伦多）

20 世纪 80 年代在珞珈山看电影、听讲座

◇ 陈东华

1983 年，我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开启了珞珈山上七年的求学生涯。读书之余，看电影、听讲座……珞珈山留下了我最美好的青春记忆。

瓜子，女生看电影时的标配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珞珈山求学的我们，最好或者说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周末看电影、开舞会。舞会经常在地上满是油腻的食堂举行，当然还有更小型、更即兴的——就在宿舍的走廊或露台；电影则在梅操（梅园小操场）看，那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看电影时，女生必不可少的标配除了那张四四方方的小板凳就是瓜子了。小板凳是进校报到时学校统一配发的，四年中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坐着它在梅操看电影（当然，还有无数次拎着它穿越整个武汉测绘学院、远征华中师范大学看电影的经历，那时

的全国高校电影巡展大都在华师进行，会持续好些天。放映的基本上都是由世界名著改编的电影，如由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改编的电影《苔丝》、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等等）。我们花一两角钱菜票，就可以从守候在宿舍楼门口的老太太手中换购到一包包大小不等的葵花子。在宿舍楼没来得及买瓜子也没有关系，那些躬着小小身子、在看电影的我们中穿梭往来的少年小贩们是绝对不会让同学们失望的。

银幕上在演绎着古今中外他人的各式花样人生，梅操上的我们则是一边与瓜子“死嗑”，一边对演员们的演技小声评头论足着。观影后，我们披星戴月走在寂静校园里，一路继续的话题仍然是电影中的角色和情节，甚至回到寝室还要在床上为之卧谈、讨论到深夜。我们寝室的 L 同学对电影中的角色有着超乎常人的记忆力，每看完一部电影，只要是电影中出现过的人物，无论角色

大小，她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电影演员的本名及饰演的角色等等，这让我们寝室对电影的讨论甚至争论变得格外热闹和激烈。每看完一部电影，大家都会将整部电影再集体回忆一遍，持不同意见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

电影散场后，梅操地上常常被铺上了一层密密实实的瓜子壳。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只快乐的小仓鼠，利用看电影这几个小时的空闲，在集体无意识地、无所顾忌地享受着物质和精神上的饕餮大餐。这也是我们在最美校园度过最美时光的一个最好缩影。我们对露天电影那盛大、热闹的场面有着深切的欢喜与热爱，从梅操中心延续到山坡上那黑压压的观影人群，是一种特别壮观的美丽景象！

那时的电影常常一放就是两场（现在仍然如此，我有时周五下班后去梅操转悠，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个传统节日还在继续，只是看电影的就只有站在操场中央的极少数人，再没有那时蔚为大观的壮丽场景了），一般是一场国内片一场国外片，5分钱一张的电影票，有时是两张、有时是四张，可能是根据电影的好看指数及能拿到胶片的难易程度决定吧。

风雨无阻的观影

一到周末，我们一般都会风雨无阻地守候在梅操等着电影开始，即使大雨倾盆，也会毫不犹豫地坚持到底。电影开映前也许看不到多少身影，但只要银幕一亮，人们就会从看不见的四面八方汇聚过来，如雨后春笋般连成一片，操场上马上就是黑压压的人



梅园小操场上光影流动，见证岁月变迁

和雨伞了。“小雕堡”（放映室）射出的那束强光就是我们心中希望的升起，就是电影开始的召集令。

有时因为雨太大，我们只能在人群和雨伞的缝隙中看银幕上影影绰绰的身影，但即使是听电影、即使全身湿透了，大家也会在风雨交加中坚持把电影“听”完。有时大雨过后，梅操的积水都能没过脚面。即使这样，也少有中途退场者。其实，珞珈山的雨是很有灵性的，基本上不怎么为难我们，真正顶着大雨观影的机会并不多；更多的是在电影放映前大雨如注，等电影真正开始时雨就小多了，有时甚至停止了。雨们应该也知道，看电影是那个年代我们最好的放松和娱乐休闲方式了。于是，在梅操端坐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带着雨水的湿气及享受完精神大餐后的精气神，回到寝室继续着心中的电影了。

梅操的现场教学

那时的老师们也是和我们一起看电影的。中文系很多老师在看电影时都能在梅

操碰到，他们总坐在相对固定的位置。於可训老师一家四口的出现格外引人注目，大家当时都以为他那年龄相差不多的两个女儿是双胞胎。他们一到场，总能引起小小的骚动，不少人还会站起来看个究竟。我听到的有关电影美学最生动、最有现场感的一课，就是在看电影时，由当时教我们《电影文学与电影艺术》课程的曹永慈老师现场讲授的。那晚看的电影是《盗名窃玉》《逃往雅典娜》，我正好坐在曹老师旁边，趁机向他请教如何欣赏电影等问题。曹老师非常热心，也非常耐心，只要电影画面中出现不一样的拍摄手法：如转移镜头、长短镜头、出画入画、切入切出、定格等等，都一一详细讲解，让我对电影艺术有了深入到技术层面的、更进一步的了解和理解。

曹老师上的这堂宝贵的现场教学课，让我对电影有了极大的兴趣，之后还写了一些影评在《长江日报》发表。尽管那时每篇影评的稿费只有七八元，但对于一个月只花费十几元生活费的我已是非常不错的额外福利了。当时班上H同学的一篇小说发表后得到136元稿费，一下就成了同学中的富翁。由于中文系学生在《长江日报》《武汉晚报》发表的作品相对多一些，《武汉晚报》副刊编辑还来到同学们中间，要与我们共同建设报纸副刊。

胶片永远在路上

记得有一次，为庆祝教师节，武汉军区搞军民共建活动，来学校为大家放映美国电影《第一滴血》（由特德·科特切夫执导，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理查德·克里纳、布莱恩·丹内利、大卫·卡罗素等联合主演的

动作片，1982年10月22日在美国上映），大家非常兴奋和期待，早早地就搬了小板凳到梅操占领有利地形。尽管胶片一开始就比预定的时间晚到了十几分钟，放完一卷后又等待了一个多小时才继续观影，大家却异常耐心和安静，没有抱怨，没有中途退场，也没有发出在此种场合经常会出现的喝倒彩和口哨声。大家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守候着下一卷胶片的到来。这应该一是为了尊重放映单位，二是因为电影确实好看。

另一次看电影《马可·波罗》三、四集，说好晚上7:40开始的，结果8:40胶片才来，放映后中间又是断断续续的。可能是那时电影胶片发行数量有限，一部电影的同一盘胶片总需在几个地方同时放映，每次放电影时就会准备一辆专门用来跑片的车辆，去某处拿胶片或将放映完的胶片送往另一放映点。观赏一部由多盘胶片组成的电影，很可能看完了这一盘，那一盘却还在别处或前来的路上，大家就得在梅操候着，一部一个多小时的电影也许得花两三个小时才能看完整。因为已经看过《马可·波罗》一、二集了，大家就坚持等着要看完三、四集。可久盼之后，等来了胶片却没有等来预想的观影惊喜，大家普遍认为三、四集比一、二集拍得差多了——也许是都等困了、等累了吧。

这就是那时候的“串片”，电影在放映过程中得排队等候着一卷一卷胶片从远处抢送过来。

.....

一起看电影的同学、与同学一起看过的电影，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中端坐在小板凳上观影的年轻的我们，就是现在的我每次走过梅操场时脑海中涌现的青春记忆，它们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渐清晰和美好。

那些年在珞珈山听过的讲座

20世纪80年代初在珞珈山求学的我们，对知识、对新生事物有着强烈的渴望与热情，仿佛少听一场讲座就少了一次与大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就少了一次成长的可能，就追不上他人前行的脚步了。所以只要看到食堂门口张贴的、认为对自己有帮助的讲座预告，大家就会趋之若鹜，就会整个人处于兴奋之中，并且马上付诸行动。伴随着听过的讲座涌来的记忆，就是为听讲座抢占座位及因抢占座位而跑过的路、吵过的架。

大家感兴趣的热门讲座大都会安排在学校容量最大的教室——教三楼的001教室，那时还没有听讲座专用的报告厅、图书馆大厅之类。

“我上午就将本子放在这个座位上了，这是我占的位子。”

“我先来的，我1点半就来了，根本没看到什么本子！”

“肯定是你把我的本子丢了！”

.....

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随着争执的加剧，火药味也变得越来越浓。每次争吵的结果基本上是：哪边人多哪边就会最终获胜，大家也不分谁是谁非。这是那时讲座开始前最常见的一幕。

为了那些可遇不可求的讲座（尽

管晚上7点才开讲），我们会午觉都不睡就拿着书本去占座位，有时甚至上午就去了，晚饭时室友们还得轮流值守在那。座位争抢到白热化时，一些平时被大家公认为优雅淑女范的女同学也早就放下身段，会为争抢一个座位完全不顾形象地一屁股坐在桌子上，以此姿态驱赶座位上的男同学；男同学此时也早就没有了怜香惜玉的绅士风度，照样岿然不动如泰山般稳坐着，你怎么激将、嘲笑、讽刺他都行，就是不挪位子。开讲前的景象经常是热闹得一塌糊涂，像极了你来我往、人头攒动的集贸市场。教室的走廊、过道上都挤满了人，窗户上也挂满、吊满了人，用“水泄不通”来形容绝不过分。

有时讲座明明预告在教三楼001教室，等我们占好座位、守候在那时，却说临时改在樱顶的大学生俱乐部了，于是学校就出现了一股强大的从教三楼穿过鲲鹏广场、拼命奔向樱顶学生俱乐部的乌压压的人流，与现在热播的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中的某



1986年3月，陈东华（右一）与室友在武汉大学樱花大道留影

些场景极其相似。等我们大汗淋漓地冲到学生俱乐部时，又说改回教三楼 001 教室了。听讲座于我们，不仅拼的是对知识的热情和渴望，更需要拼的是体力和耐力。有时为了听一场心仪的讲座，我们得在校园戮力狂奔数趟，更重要的是，为了抢占有利地形，我们得拿出不亚于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精气神和勇往直前的锐气。尽管每一场讲座都听得千辛万苦，大家的热情却从未消减过。内容丰富的各种讲座，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点燃了我们心中的梦想和希望，滋养了我们的精神和灵魂。

一次，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丁玲的讲座在南一楼（行政大楼往万林艺术博物馆方向的路上）最大的教室举行。大家当然是蜂拥而去，以求一睹为快！

那天的丁玲穿了一件红黑相间的格子衬衫及深红色外套，戴一幅茶色眼镜，她神采奕奕地举着双手向我们走来，全场掌声雷动、欢呼雀跃。看着一张张青春洋溢的笑脸，丁玲的步伐也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轻盈。这是一位青春永驻、活力四射的老人！

丁玲给大家作了一场热情洋溢的报告，讲述了她的生活经历、成长过程及奋斗之歌；回忆了她 60 多年来走过的革命之路及发生在她身上的几次大的人生转折；希望在座的我们再没有 20 世纪 30 年代时的她们那样的苦闷和烦恼，希望我们有勇往直前的探索精神，希望我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多作贡献……

讲座进行至正酣处（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教室突然停电了。在珞珈山重新回到青春岁月的丁玲，倡议大家用唱歌等待来电。她和爱人陈明一起带头高唱《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并担任了临时指挥。这时的她精力充沛、热

情洋溢、动作敏捷，完全不像一位年过八十的老者（她是来做讲座的前一天过的 80 岁生日）。从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永远张扬的青春活力、永远昂扬向上的激情斗志。此时的她，更像一位年方十八、青春正盛、朝气蓬勃的小姑娘，就像她自己在讲座上说的：“我今年八十明年十八！”这应该就是真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吧！年过八十的她，竟然站着讲了近两个小时。

由此想起学校最近某晚停电时，湖滨某栋男生宿舍自发而起的歌曲联唱，还有苏德超教授在停电时、在教室里继续着的“形而上学”课程，这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我们在丁玲老人的指挥下、高唱革命歌曲的场景是多么惊人的相似，这是否说明每一位来到珞珈山以及在珞珈山生活过的人，身上和心中都会生长出一种质朴的浪漫，一种积极向上、永往直前的精神？这或许就是珞珈山精神气质的一脉相承吧！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生活在珞珈山的我们，听过的讲座还有很多，如：青年作家韩少功指点文坛江山、激扬当代文学的激情发言；老作家姚雪垠极具特色的创作漫谈；当时第一届作家班（在刘道玉校长教育体制改革下开始创办作家班，从三年级开始，学习两年，毕业后拿本科文凭）学员严婷婷、水运宪给我们讲授“创作·读书·阅历”等等；我们还听过“知识男性与知识女性的恋爱观比较”等现实性、实用性较强的讲座。

……

黑夜对话哲学，眼眸升起灯塔……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求，是珞珈人心中永远闪耀的光芒。

（陈东华：武汉大学中文系 1983 级校友）

华中国际车展按下武汉会展的重启键

◇ 张 琚

2020年8月17日，为期5天的第十八届华中国际车展圆满、安全地闭幕。这是武汉在城市重启后，举办的本土首场大型线下展会，对武汉会展业乃至整个城市的复苏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正是它按下了武汉会展的重启键。

华中国际车展，是我们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在武汉总部的车展项目，对于全国各地的子公司而言，有着“母展”的地位，它的意义之于尚格会展不言而喻。2020年，这样一场展会能在武汉举办，毫无疑问得益于市政协的大力推动。我和整个公司都将铭记在心。

问题：行业冰封，武汉会展业何时重启

2020年的开端格外艰难，一场疫情突如其来，让每个人都措手不及。作为一名武汉人，这样的感触更为强烈。

即便在4月8日城市解封后，复工复产的脚步仍然沉重。我所处的会展行业尤其如此，因为人流聚集的属性，组织压力大，防疫压力更大。

在外省，长沙首届汽车消费节在五一劳动节打响了疫后全国会展业“第一枪”，牵动了百万会展人躁动的心，一个区域性消费展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追捧，给处于焦虑等待中的行业带来了一线生机，更让长沙这个城市成了自信与担当的一张名片。湘人性格中“霸蛮”的一面令人鼓舞。

5月底，我们公司也正式复工，在广西南宁、贵州贵阳、四川绵阳等各地子公司的车展项目都陆续开展。然而，身在公司总部，身在曾经的疫情中心，武汉并没有任何标志性意义的展会举行。作为一个会展人，这让我颇为不安。

6月2日，按照湖北省委的统一部署，受湖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



2020年8月14日，武汉市政协主席胡曙光（左四）一行来到第十八届华中国际汽车展览会现场考察，武汉市政协委员、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珺（左五）陪同参观

记王兆明的委托，湖北省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经济处处长陈海洋一行，来到我公司武汉总部调研。

陈处长详细了解尚格会展在复工复产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尤其是对复工复产后会展领域的开放情况进行了询问和了解。我则向陈处长提出建议：借鉴“长沙经验”，通过组织一个标杆意义的重大商务、文体活动，向外界释放更多的积极信号，跑出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度”。当天调研结束，我特意邀请陈处长摘掉口罩，在公司大厅合影，表明我们的自信。

解决：合力突围，市政协领导大力推进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

6月12日，我们决定摸着石头过河，在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确定性消息的前提下，给自己下了一个KPI（关键绩效指标）：2020第十八届华中国际车展，争取于8月

13日～17日，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巧合的是，就在当晚，湖北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109场新闻发布会，湖北省副省长杨云彦宣布：6月13日零时起，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下调至三级。由此，也带来一系列防控防疫措施的调整。其中，特别点明“有序恢复会议会展”。

7月，市政协监督性主席会议召开，会议围绕“促进中小微企业生存与发展”主题开展专项协商监督。作为会议议题之一，我所在的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上报的“尽快推动会展业复工复产”调研课题引起了市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

会展业复工复产意味着武汉疫后的全面复苏，对武汉疫后恢复具有标志性意义。但是，条件是否成熟？又面临哪些难题？

7月14日，推动我市会展业复工复产专题座谈会在我公司召开。市政协党组成员陈邈馨出席此次专题座谈会，并做了重要讲话。

会上，我对出席会议的各位领导表达了两个想法：一方面是“理解”，毕竟以往是备案制，今年涉及防疫，没有先例，程序上比较复杂；另一方面是“渴望”，要知道，武汉作为低风险地区，我们完全具备办展条件。

“复工复产呼声再高，没有具体的行动落实，怎么能让企业活下来？职能部门要有担当，落实责任。”带队调研的市政协党组成员陈邈馨语气沉重，却也让我感受到了政协领导的魄力与勇气。

就在专题座谈会后的一个月时间内，市政协先后与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沟通十余次，一系列推动华中国际车展顺利召开的标志性事件也因此发生：

7月28日，车展展馆所在地的汉阳区人民政府专门组织了会展业复工复展工作现场调度会，区政府副区长陈伟诚出席会议并讲话，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区卫健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管局、区公安分局、洲头街办事处等部门参加会议。

8月5日，武汉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通报第十四届中国品牌节年会和第十八届华中国际汽车展两大活动（一会一展）相关情况，确定8月13日第十八届华中国际车展正式开展。

尚格会展所有同事的干劲也越来越足：市场方面，我们通过线上、线下各类媒体，积极推广传播车展即将举办的声音，覆盖整个“1+8”城市圈市民生活的基本场景；招商方面，不少车企品牌听闻武汉要举办车展，都觉得这是一次能够以亲身行为给英雄城市点赞加油的机会，让车展组委会收获太多感动。

经过不到60天紧张忙碌的筹备，华中国际车展如约亮相，武汉会展也由此重启。

成果：领导肯定，登上央视《新闻联播》

为助推我市会展业回暖复苏，8月14日上午，市政协主席胡曙光一行，来到第十八届华中国际汽车展览会现场考察。进入展馆前，胡主席就特别关注华中国际车展在疫情防控方面的部署情况。我向胡主席汇报，车展严格按照“六必一限”总原则安排疫情防控工作，尽全力保障车展安全、顺利、圆满地召开。

进入展馆后，我全程陪同胡主席巡馆，尤其在东风风神、广汽本田、一汽大众等展台，胡主席聊品牌、问技术，并询问政府补贴落实以及军人、医护工作者等购车优惠情况，对车展的各项细节都非常关心。

胡主席还指出，华中国际车展经过18年的发展，已成为华中地区极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品牌盛会，是各大汽车厂商展示新产品、新技术和汽车销售的重要平台，也是武汉市民买车选车的重要渠道，它对当前武汉扩内需、促消费、活跃市场、提振信心必将起到积极作用。他还要求，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调研、履职尽责，助推武汉会展业加快复苏。

胡主席此举，既是为车展站台助威，也是为武汉市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加油鼓劲，更是为武汉经济重振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车展开幕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对华中国际车展做了报道，这是除北京车展外，唯一登上《新闻联播》的车展项目，足见车展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场商务活动本身。

真的非常感谢市政协帮助华中国际车展成功实现了“疫后首展”，也多亏了这场车展，我们企业才能活下来，有了更多发展的机遇。市政协强力助推武汉会展业复工复产，也是向世界亮出了“武汉信心”。

（张璐：十二、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的教育之路

◇ 张际爱

2021年3月，春风送暖，万物复苏，我和学生们重返校园。回首自己从教的32个春秋，内心总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感与眷念，我人生旅程的每一步都与学校紧密相连。

苦乐年华，逐梦前行

翻阅尘封的记忆，学生时代一些苦中作乐的片段依稀可辨。1979年，我在一所离家6里远的初中上学，从家里到学校要走半个多小时。每天中午，几个小伙伴结伴穿行在狭窄的田埂间，偶尔钻进哪家菜地，能摸到个瓜果解馋，那真是意外的惊喜。学校是一所砖瓦结构的四合院，破旧的教室挡不住夏天的风雨、冬天的严寒。那时学校没有课桌椅，学生要自带桌子板凳，每到新学期开学，我们两人一组抬张桌子上学，双手磨破了也只能咬牙坚持。食堂的早餐只有稀

饭，就着自带的腌菜喝下去。到上午第四节课时，我经常是饥肠辘辘，根本无心听老师讲课。晚自习经常停电，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几个人围坐在一盏煤油灯下偷着乐，老师很难发现。

读初二时，学校有位教语文的吴老师。一次，他的文章在一份杂志上发表了，喜讯传遍校园，全校师生兴奋不已，吴老师成为大家崇拜的偶像。虽然我没有读过吴老师的作品，但是那份仰慕之情，在年少的我心底催生了一个梦想——将来也要当老师，一边教书一边创作。

1982年，我考入新洲一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召唤，点燃了学子们心中的希望。老师起早贪黑，学生勤学苦读。师生一道，吃的是咸菜拌饭，住的是拥挤不堪的旧瓦房，夏天没有电扇，冬天没有热水。艰苦的生活、简陋的环境磨炼着我们的意志，也培养了我们自立自强、乐观向上的品质。那

时浓厚的学习氛围、融洽的师生关系，以及老师们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我日后做一名教师树立了榜样。

1985年，我考入湖北大学生物专业就读。第一次来到武汉，都市的繁华、美丽的校园让我对大学生活充满好奇。老师带领我们走入奇妙的生物世界，学习细胞、个体、生物圈的结构功能，追寻生命活动的轨迹，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实验课上亲手解剖青蛙、小白兔，在显微镜下观察微观世界，还到庐山、神农架进行野外动植物学实习。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我们辨认各类珍稀物种，学习制作动植物标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保护生物多样性，才能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学校还开设五花八门的选修课。那时几乎每个单位门口都有块“出入下车”的牌子，要求骑车进出时必须下车推行。有感于此，大三的时候我选修漫画课，画了一群小鸡在门口排队入场，题为《循规蹈矩》的作品，经邹敬泉老师润色，被推荐到《人民日报》漫画增刊，竟然挣了十几块钱稿费，算是圆了自己少年时的“创作梦”。

初为人师，青涩迷茫

1989年我大学毕业，恰逢基础教育改革，高考取消生物科目，这意味着我们这些生物专业的学生很多要转行。我被分配到原来读初中的那所中学。走进校门，看到的是依然破旧的校舍、坑坑洼洼的操场。校长告诉我：学校急需英语老师。别无选择，我拿起了英语教材。正是书生意气的年龄，面对艰苦的条件、专业不对口的尴尬，自己顿感失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太大，在这偏僻的角落，似乎看不到前途。



2018年12月，张际爱委员参加武汉市新洲区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留影

记得第一次上英语课，一节课的内容，我二十几分钟就讲完了，多出来一半的时间无所适从。所幸，很多同事是我曾经的老师，在我迷茫困顿的时候，他们给予了无尽的帮助，指导我如何备课，如何把握重难点，怎样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老师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时时令我感动。每次走进教室，面对几十双清澈的眼睛，他们是和我一样期待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啊。身边的点点滴滴渐渐唤醒了迷茫中的我，既然选择了教师职业，就必须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做好学生人生路上的领航员，让每一位与我同行的孩子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一切从头开始，我虚心向同行老师请教，悉心钻研教材，精心设计教学方案，认真上好每一节课，真诚鼓励学生努力学习。课堂上学生们会心的笑容、考试后优异的成绩，让我有了满满的成就感。慢慢地，

我克服了内心的浮躁彷徨，能够静下心来学习工作，静下心来与学生交流。在老师的引领下，学生的心智成长了，幸福感便油然而生。教师，是一份时时在付出又时时有收获的职业。

扎根教坛，教学相长

1996年，新洲区筹建实验中学，面向全区招聘老师，我有幸进入这所新建的学校。开始担任班主任时，既要研究教学，又要研究学生，对我来说这是新的挑战。那时很多学生家长外出打工，学生在校寄宿。没有父母陪伴的孩子，更加需要老师的关爱。每一天，我认真做好备课、课程辅导、批改

作业等环节，还要关注学生的心理、情感等这些有温度的东西，给家境贫寒的学生一份贴心的温暖，给患病学生送去及时的安慰，给学有困难的学生一声亲切的鼓励……日复一日，用真诚、阳光的心态迎接每一件琐碎的事情。

时代在进步，教育观念在不断更新。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新课程改革，倡导教师角色从知识的传授者变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2004年，我参加全国骨干教师新课程改革培训。回到学校，我紧跟改革步伐，积极践行新课改理念，从引导学生如何学习的角度组织教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通过反复摸索、实践、反思，自己的角色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我的付出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学校的肯定、家长的好评。

随着生物科目恢复进入高考，高中生物老师紧缺。带着对所专业的执着，2006年，我进入新洲区城关高中改教生物，再次重新出发。时隔17年，翻开教材，每一章每一节都显得有些陌生。为了尽快熟悉教学内容，这一年的暑假，我啃完了几本教材，还做了两大本高考习题集。城关高中是一所市级艺术特色高中，这里的多数学生有美术、音乐方面的特长，但是文化基础薄弱。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由于教育对象不同，我适时调整教学思路，以尊重、理解赢得了学生的信任。

近年来，学校办学条件逐渐改善，教学手段也推陈出新，电子白板、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设备走进课堂。这些设施的普及，对教师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们面对的学生，生活在互联网时代，视野开阔，思想活跃。为了适应这些变化，虽然已年过半百，我仍以年轻的姿态，尝试制作图、文、声、像并茂的课件，主动参加心理健康、青



2021年3月，张际爱在新洲区实验中学教学留影

春期女童性教育等培训。教育改革一直在路上，我的探索也在进行中……

三十多年守望教育的路上，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前辈真诚的引导，学生们纯真的笑脸；也获得过这样那样的荣誉，而最令我感到欣慰的还是走在人群中不经意的一声问候：“张老师好，我是您××届学生。”或许是位阳光青年，或许是位有为中年，总有一种特别的人生享受。

履职尽责，为教育建言

一路走来，学校给了我前行的动力，学校也给予我成长的平台。2002年至今，我担任过新洲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任区政协常委、农工党新洲区支部宣传委员。作为一名教育界的委员，为教育的发展和学校的明天积极建言是我应尽的职责。

很长一段时间，我注意到城区中小学周边餐饮店普遍存在饮食卫生方面的安全隐患；每天上学、放学人流高峰时段，流动摊点多，占道经营现象突出；接送孩子的车辆乱停乱放，严重堵塞交通。相关职能部门虽然多次重拳整治，但缺乏长效管理机制，整治效果不佳。这一老大难问题是难点，也是热点。我决定通过政协提案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为了写好这份提案，我多次到不同学校实地调研，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区政协五届八次常委会上做了《创建平安校园要补齐安全管理短板》的发言，建议在学生上学、放学时段，有警察、城管执法人员到校园周边巡查值守，邀请家长志愿者参与维持秩序。这一建议得到公安、城管、教育等部门的积极回应，并建立起协作联动的长效机制，有效改善了校园周边秩序，保证了学生的出行安全。

疫情期间，我坚持网络教学的同时，密切关注线上教学、复课复学等热点问题，大量收集信息，深入调研思考，撰写了《关于对教师进行网上教学能力培训的建议》等4篇社情民意信息报市防疫指挥部，为其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

这些年里，在政协和党派平台上，我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撰写了近50篇提案或社情民意信息，其中《以绩效工资为契机 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提高中小学实验室使用率的建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文化要先行》等十多篇被各级政协组织、农工党采用。2019年，我被农工党武汉市委授予“双岗建功十佳优秀党员”称号。

流年似水，岁月如歌。虽然岁月的年轮已爬上眉梢，但不变的是一颗教书育人、忠于职守的初心。我愿做校园里的一株香樟树，守望着一届又一届学生，用热忱、关爱滋养他们一天天成长、一天天进步。

（张际爱：武汉市新洲区政协常委，新洲区实验中学教师）

回眸建国初期的武汉二中

◇ 巴忠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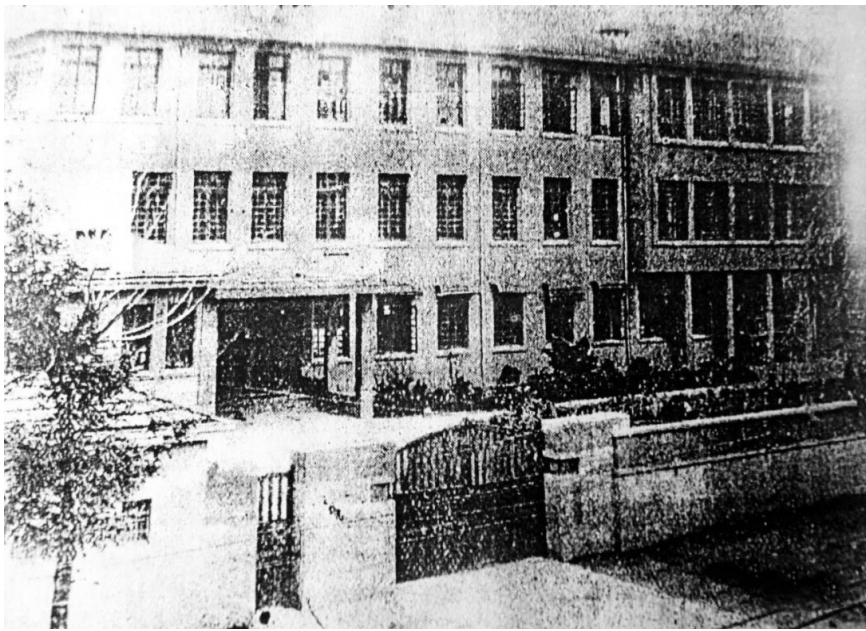
每当我回到武汉市第二中学，看到那漂亮的校舍、带有空调的数字化教室、现代化的地下体育馆、数字化的图书馆、餐馆式的师生食堂等等，都会勾起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

我是1950年9月考进武汉市立第二男子中学的，被分配在初一乙班。自此，我从学生到留校任青年团专职干部，到任语文教师、语文教研组副组长、教师党支部书记、党总支青年委员，抽调参加“四清”工作队，一直到1966年6月离开二中，调入武汉市星火中学任党支部副书记，在武汉二中的时间长达16年之久。因此，这些年来，二中的每一个变化、每一次发展，都深深地牵动着我的心。

刚进二中，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破败不堪。战争留下的痕迹历历在目，较完整的建筑物只有进校门的一排教师办公室。教室则是被炸弹炸得从三楼直穿到一楼的一排空架子。地面全是碎砖乱瓦，课桌破旧不说，想摆平还要找砖瓦垫起来。屋顶和窗架都被烧毁了。为了上课，屋顶铺了层瓦，窗户用芦席挡着，这样虽可以遮蔽风雨，但仍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风是挡不住的。上课时麻雀在教室里乱飞，叽叽喳喳吵得人心烦，不时还有鸟屎拉在桌上、身上。

至于环境，那更谈不得了。紧靠中山大道的礼堂完全被炸弹炸平了，除剩下的一个外楼梯和平台，只有一堆乱砖碎瓦，杂草丛生，满目凄凉，成了鼠、蛇的藏身之地。

靠近旧京汉铁路和现在七一中学的围墙内，有两排防空洞，上面长满了杂树、野草和蓖麻，那里比较清静，成了课后学生看书和游玩的去处。紧靠围墙边的大厕所，是一条大沟式的蹲坑，蝇舞蛆拱，臭气熏天。前面有一块空地，是生物老师的教学园地，地方虽不大，但在生物老师王昌麒的指导下，学生们在这里做实验、搞嫁接，学到了不少知识。



20 世纪 50 年代的武汉二中老校门

靠近教学大楼头上，就是学校的食堂，这是一个用木头支起来、上面铺上瓦的大棚子。厨房也很简陋，也是个棚子，只是用芦席围了起来。两个大灶，一个炒菜，一个蒸饭。洗菜是在一个大池子里，菜根本洗不干净，经常吃出虫子、蚯蚓，甚至大粪。厨师更谈不上卫生体检，他是一个国民党的老兵，老得嘴里只剩下了几颗牙齿，炒菜时鼻涕、口水直流，一次竟把一颗牙齿也掉到了锅里，与菜一起端上了餐桌。当时伙食是外包给私人的，他们为了赚钱，连炒菜锅里都不放油，只是等菜做好了在上面淋一层菜油，看起来油挺多，实则是一层浮油。为此，同学们曾进行过多次抗议，有一次还将桌子掀翻了。后来在李成文校长的干预下，伙食才有所改善。

当时二中只有 30 个班，每个年级 5 个班，学生来自全市四面八方，多为贫苦子弟，都是冲着二中这所公立学校学费较便宜来的。加之当时交通十分不便，全市只有几辆公共汽车，因此远道来的学生多是住校。

但那时连教室都是漏风漏雨的，哪里还有寝室！于是教室便成了寝室，白天上课，晚上把地铺平，再把自带的被褥铺上，一个人挨着一个人，挤在一起暖和些；早晨起来把铺盖一卷，堆在教室后面。但即便是这样也住不下。学校就利用被飞机炸毁的礼堂外楼梯，用芦席一围，把双人架子床沿楼梯摆放，就成了一间不错的寝室。后来政府把位于长春街的首义学校拨给了二中，一部分做了教工宿舍，一栋被炸坏了的二层楼，经学校稍微修缮，作为学生宿舍，这样学生们才从教室里搬进这个大筒仓似的宿舍，条件大大改善。这里有一个澡堂，每周可供学生洗个热水澡，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奢侈的了。最值得二中学生夸耀的是，在操场的西北角有一个 30 米 × 15 米的小游泳池，夏天时每个班可以轮流在这里上游泳课。二中那时的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不仅没有影响到教学，还培养了学生艰苦奋斗、勤劳俭朴的品质。

二中当时的校长是李成文（后任湖北大学校长）。他是个老革命，长期从事党的

地下工作，被捕过，坐过牢，残破的手指甲是他坐牢受刑时留下的痕迹。他爱惜人才，懂得教育，办教育真正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理念。他网罗了一批德才兼备的老师，如语文组的朱忱、钟少衡，数学组的汪锦云、肖玉兰，理化生组的汪成范、陈英、王昌麒，外语组的邓元贞、刘景炎，史地组的陈云祥等等，他们都各有专长，对学生要求严格，又循循善诱。

对学生的教育，二中是开放式的，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那时学生的课外生活十分活跃，团委、学生会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在学生的政治生活、思想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个年代社会上的政治活动很多，学生除了搞好本身的学业以外，还要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如：抗美援朝时参军参干，“三反”“五反”、审干时负责看管受审查的“老虎”（被怀疑有问题的教职工），参加1954年防汛抗洪、上堤抢险，大跃进时参加大办钢铁等等。这些活

动的参加，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组织能力，为他们以后踏上社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二中的学生不读死书，他们的许多知识不仅仅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学生中的社团活动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二中学生的课外活动十分丰富，学生们根据各自的兴趣爱好成立了各种社团，有年级的，有全校性的，有剧团、诗社、乐队、合唱团、各种运动队等等。每天下午课后，操场上、教室里、防空洞一带，都有各类社团活动的影子。每到重大节日，社团都会举办各种活动。每年的元旦晚会更是热闹，学生们忙着砍柏树枝，在教室门口扎牌楼、写对联，还互相评比，看哪个班扎得更漂亮。有的在教室里办联欢会，有的在操场上办营火晚会，一直要闹到深夜。

二中过去是一所男中，没有女生，但有些活动又少不了女生，为此团委和学生会就经常组织与武汉十六女中的联谊会。为了一些演出活动，还要

“借”十六女中的女生来参加。记得在初二年级时，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青春之歌》和《黄继光》需要女演员，就只好求助于十六女中。在这两个话剧中，我都扮演主角，那时的许还山演的还是配角（他后来竟成了著名演员，真没想到）。为了演黄继光，我们到部队去借枪支，借棉军衣，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



1965年，武汉二中欢送支边同学赴新疆

持。这两场戏在后来修好的大礼堂演出时，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和好评。直到今天我还在想，一群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能做好自编自演、组织化妆、筹措道具等一系列的组织工作，简直不敢想象。当时的剧照被我保存了下来，交给学校，至今还挂在办公楼二楼走廊的墙壁上，再现了当年的真实情景，十分珍贵。

二中的体育运动当时名闻全市，出了几名运动健将。殷正德创下的百米短跑全国纪录，保持了好几年。每次全市的中学生运动会，二中都是团体总分第一。有一年的大中学生运动会，二中照样是团体总分第一，这可是二中最牛的事。这样的纪录一直保持了多年。由于每次参加市里的大型游行活动和运动会，二中的学生都是穿着黑裤子、白衬衫，胸前缝了个自己用红布做的楷书“二中”二字，十分显眼。在一次活动中，分管宣教、文化工作的市委书记李尔重问：“这是哪个学校的？”被告知是二男中的，李书记说：“哦，是红二中的。”从此，“红二中”扬名全市。其实二中之所以红，不仅仅是因为这两个红字，更重要的是它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始终贯穿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理念，尤其是把德育放在第一位，首先教育学生学会做人。二中教学质量高，首先体现在德育上。记得有一年的高考，郭超人考试成绩优异，但因家庭出身不好，没被录取。他一时想不通，出走了。李成文校长得知后，一方面派师生到处寻找，一方面到招生办说明郭超人的情况，要求录取。最后，李校长以一个老党员的党籍与校长的身份做担保，经过反复交涉，郭超人才被同意录取。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唯成分论的年代，李校长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后来郭超人出版了《向顶峰冲刺》《西藏十年间》《时代的回声》

等作品，成了新华社的社长、中共中央委员，这些都与二中的培养，与二中教师不仅授业解惑，更重视育人、识人是分不开的。还有一些学生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们坚守信念，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做人的原则，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都与在二中打下的坚实基础分不开。

现在的二中已今非昔比，不仅学校的环境、教学设备、学习、生活条件等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教学理念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二中已是声名远播，历届高考成绩都名列前茅，成了家长和学生慕名追求的名校。但我总是在想，不管如何变，不管条件多么优越，二中过去那种勤俭办校、开门办学，那种教书先育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理念是不会变的。愿二中永远是“红二中”，为祖国培养出更多德智体全面发展、德才兼备的可用人才。

（巴忠人：原武汉市委保密委办公室主任，市保密局局长）

我的学徒生涯

◇ 肖人杰

(一)

1948年的武汉，时局动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靠拿薪水生活的人，领到当月薪水后，马上就到钱庄去换“袁大头”，稍稍去晚了，手里的这点钱就贬值了。那年头，一家老小还靠它过生活呢。那个时候，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关金券、金圆券一直贬值，而银元贩子满天飞，他们把持了金融市场。据说惹恼了当局，来了个杀鸡儆猴，在统一街口突击抓银元贩子，当场枪毙了一个人，可局势并没有得到缓解。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我的学徒生涯的。

我们家家大口阔，男孩子是按“松、

鹤、遐、龄、元、奎”来起名字。人松哥已结婚外住，人鹤哥在药店当学徒，我原名叫萧人遐，下面的弟弟都很小。爸爸生意无着，没有钱养这么多人。当时在药材行内有位傅逸安先生，他又经营照相馆，爸爸决定送我去当学徒，这样既可以减少吃饭的人口，又可让我学一门技术。没有经过任何商量，我从长堤街小学退学，来到位于友益街中心、大舞台戏院隔壁的“千秋照相馆”当学徒。我其实对时事似懂非懂，对当学徒也没想什么，只是按父母的话去做，就是要听老板和师傅的话，要主动多做事，就这么简单。

到了照相馆后，我知道了傅逸安并不管事，管事的是他的亲戚（他的三伯），我们叫“三大爹”；做饭的也是他的亲戚、

一个瘦矮小个的老妇人，我们叫她“姑太”；还有三个师傅、一个师兄。按行规，刚来的学徒首先做杂事，师兄就上楼跟师学技术了。

我做的第一件杂事是生炉子。每天早上起床，首先是给姑太生炉子。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些，点火、引燃木柴、把煤球烧着，然后烧开水。我开始怎么也烧不着，一搞个把钟头。姑太先是说我无用，再来教我，慢慢地我也会了。不过我在点火中也玩了巧——为了方便，我就用盐，盐一炸，就很快点了。后来我还想快，就偷偷把吃的油往里浇，这就更快了。不久被姑太发现了，她说怎么厨房有一股油烟味，又说炒菜的油少了。她将这事给三大爹讲了，我被狠狠地骂了一顿。

生完炉子，接着我要把楼上楼下的地板都拖一遍；9点钟，下橱窗的板子，开门，抹门窗和玻璃；闲下来就坐着等待客人上门。取相的由我发，照相的上楼，我就按铃通知楼上。晚上一般八九点钟打烊，这时又是收工的事，师傅在暗房冲了底片，在显影、定影后，要用清水冲十几遍。这个比较费时，因为换水不能太急，要有时间间隔。特别是热天，暗房很热，自来水有时也热，就买冰镇，晚上一搞就是几个钟头，老板和师傅们都睡了，而我却要熬着干，经常是转钟后才能入睡。那时太想睡觉了，我有时心急，巴不得快点搞完，一不留意把底片划了一下，那就不得了了，第二天肯定要挨骂，有时把印子划大了，师傅修补不了，还得重照。

晚上洗澡，就是胡乱地打自来水往身上一淋就算了。我睡的地方就是别人照相的地毯，可恶的蚊子满天飞，一抓一大把。爸妈没给我买蚊帐，一躺下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一看，浑身上下都被蚊子咬遍了，没

有一块好皮肤。老板娘看了，只是说了一句：“这伢身上怎么尽是红点子！”想到自己这么可怜，我有时心里暗暗流泪。

（二）

白天，我守着柜台迎接顾客、登记取相，有时也偷看一下报纸，但不到一会儿就睡了起来，耳朵却还听着楼上的脚步声，一听到有人下楼，就马上打起了精神。那时，我和师兄都是没有零花钱的，每月老板娘看到我们的头发长了，就把几个零角子给我们，到隔壁巷子里找个剃头摊子剃个头。我们没有过早的事，老板、老板娘、师傅都起得晚，我劳累了一早上，肚子饿得咕咕叫，但没有早过，只有水喝。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要先给老板娘和师傅添好饭，然后才能给自己盛饭，吃的时候眼睛还要时刻看着他们的碗里，他们吃完了马上要放下碗再给他们盛饭。吃饭时一般鸦雀无声，我是学徒只能吃自己一边的小菜，不能伸长筷子去夹对面好吃的菜。如果老板娘这天高兴了，她会夸夸其谈一阵，其他人也点头应承；有时她会给我夹点好菜，还说：“伢啊，学‘贼’一些，看事做事，莫偷懒，做事勤快些、麻利些。如今时局这乱，赚几个钱也不容易。”这话也不知是说给我听的还是说给师傅们听的。反正大家快点扒饭，吃完了就上楼做事。而我，有时因大家不好意思多夹菜，会剩下一些，正好就独自猛吃。

那姑太也嘴馋，看到有多多的菜，也和我分食一些，然后就由我洗碗。她经常找我的毛病，有时也会劝导我：“伢啊，要多长心眼，看事做事，没有事时，就上楼给吴师傅倒杯茶水，巴结一点，将来再来了人，你还不是要指望师傅的。”这话我是听在了心

里。不过三大爹这人太“坏”，时刻都盯着我，只要我稍稍眯一下，就会大声训斥。有一回，我和师兄两人逗着玩，像打架似的，两人抱在一起，恰巧叫他看到了。这还了得，打起架来了，造反了！不容我们分辩，他就罚我们两个靠墙跪下，我们都气得哭了。大约跪了个把钟头，姑太出来转弯：“算了，认错就行了，下次再莫打架就是了。”这时三大爹就吼道：“还不起来谢谢姑太！”

我一个爱说、爱动、爱玩的小孩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能呆得下去？一天到晚干粗活，又不让我学技术，每天看三大爹的白眼，虽然他从没有打过我，但看到他我心里就打颤，确实不想干了。有时回家去拿衣物，想诉诉苦，爸爸那里不容分说，马上催我回店里去。



武汉解放前夕，肖人杰在学徒的千秋照相馆留影

有一回我从家里出来，走到了集家嘴河边。那时天已暗下来了，起着风，还下着小雨，我一步步走下台阶，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独自在雨中停留了很长时间，默默地想些痛苦的事，竟突然想到了死。也许是那时看到报纸上天天有人自杀的消息，小小年纪的我也产生了一死百了的念头。我流着泪，正在雨夜里乱想时，上面传来了一个粗声音：“下面是哪个人呀？快上来吧，下这么大的雨！”我顿时惊醒了，慢慢从岸下一步步上来，不情愿地朝照相馆走去。

后来想起来，我当时是幼稚的，想法也是不稳定的，在那种环境下，最终只能是逆来顺受，同时也让我产生了报复心。我开始想着用些什么办法“害”他们，但一定要做得隐蔽。有一次，老板娘心血来潮，想去土地庙烧点香，保佑他们一家大小平安，保佑生意兴隆，但她又不愿亲自去，就把了一些钱给我，要我买香纸、蜡烛去土地庙敬奉。我很高兴能趁机出门玩一下，走在路上又打起了小算盘。我心想：我去不去她又不知道，偏就不去，把钱留下来自己零花。就这样，我在外面游荡了两个多小时，回去交了差。老板娘却什么也没问，她对菩萨算是尽了心。我做了这件丑事，心里总是有点不安。

（三）

在照相馆呆久了，我也从中看到一些名堂。老板主要忙别的生意，从不多管照相馆的事，这里的大权落在三大爹手里，店里一切由他管理。老板娘表面上不管，而暗时无时不在盯着，但她从不出面，她会吹枕头风，有时也说句风凉话。而那位姑太，表面上都喊得亲热，而实际上她就是一个厨子。

这三个人有时都会摆出一副当家相，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却勾心斗角。有一次，三大爹和姑太起了别扭，虽没听见两人吵架，但相互不讲话了，有些话要我来传达。姑太说厨房菜油、米完了要买，要我跟三大爹说；三大爹说今天下午要来两个人吃饭，要多烧点饭，也要我当传达。我一一照办。有时姑太偷偷说一些三大爹的坏话，我也不敢作声。后来我才明白，其实这是权势之争，在老板和老板娘之下，都想当二老板，摆摆神气的样子。

一天早上，姑太要我洗菜，我做了，又要我砍柴火，我也做了，连米也要我淘。我慢吞吞地做，而她坐在椅子上指手划脚，还发起脾气来，说我总是偷懒。我一肚子不高兴，觉得这些事本来应该是她做的。老板娘来了，拿来些衣服和袜子要姑太洗。姑太当面显得很热情的样子，等老板娘一走，就把嘴一撇，自言自语地说：“哎，连臭袜子也叫我洗。”我却暗暗得意，心想：你还不是一个下人，何必总在我面前耍威风！我的报复心又来了。姑太洗完后就上楼去晒，我等她离开后，趁没有人注意时把老板娘的丝光洋袜子用钎子挑断了几根丝后赶紧逃开了。晚上老板娘就喊开了：“姑太，您家的手怎么这粗，您家看看，把这好的一双袜子弄成这个样，还怎么穿！您家以后洗东西还是要注意点。”姑太还在辩解说：“没有啊！我还是蛮过细的呀！”老板娘顶了一句：“算了，莫犟了，您家自己好好看看。”姑太一看老实了，再也不敢做声了。

临近解放前夕，市面上很乱，国民党也管严了，经常查户口，每次查都是深更半夜，把人都叫起来，按户口清点人头，还要到处检查有没有“黑人”，如果没有户口就要带人到局子里问话。有一次，刚查完户口，

因急于睡觉，老板娘把户口本往桌上一放就忘了。第二天我起得早，看见那“要命”的户口本，就使坏把它藏了起来。过了很长时间，大概一两个月吧，我看没有动静，便把它当引火的生了炉子。谁知恰好又碰到一次半夜查户口，老板娘在她房里的柜子中找出一个盒子，但怎么翻也找不到户口本。这就巧了，放在盒子里怎么会没有了呢？老板说：“你好好想想，放在哪里了？”老板娘说：“我总是放在这盒子里，从来不放别的地方。”屋里翻得乱七八糟，还是找不到。这时警察局的人发脾气了：“怎么搞的？难道要我们今晚就检查你们一家？再找不出来就跟我们到局子里走一趟！”大家都吓住了，还是老板见过些世面，先把烟拿出来一递，然后把领头的警官喊到旁边一站，耳语了几句，又到房里拿了一个纸包往警官口袋里一塞，警官马上态度好转了：“今天时候不早了，我们还有公事，下次再没有那就要带人了，听到了没有？”老板连连点头：“是是是……”

警察走了之后，老板吩咐道：“没事了，大家睡觉吧。”而我却吓得够呛，怎么也睡不着，只听得老板房内两人在闹，老板说：

“你好好想想，究竟放在哪里去了？”老板娘一口咬定就是放在这个盒子里，并说：“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会随便乱放呢？再说，那房里又没有别人进来，真是出了鬼了。”让我庆幸的是，他们始终没有回忆起上次查户口的事来。这件事是个谜，谁也解不开。我估计，老板最后叫三大爹去局子里花钱补办了，因为过了几天我听三大爹吃饭时跟师傅们说：“补个户口好难啊，还要到报馆里登报申明，又麻烦又花钱。我找了老街坊的儿子，是在局子做饭的，他请人通融了一下，塞了两条烟，才办了下來。”

到了1949年春，时局越变越乱了，《大刚报》经常脱版，街上的报贩只要在叫卖，我就得跑去买回来。我看见报贩们总是连喊带跑的，大声叫道：“嘿！不得了！不得了！‘共军’又占领了×××，快逼近武汉了！快看快看，‘国军’加固防线，誓死保卫武汉！”

师傅们都围拢来，争看时事和战况的版面，口里不断传出“啧啧”的声音。我们店临正街，过去来往的人很多，现在人少多了，人们哪有心思来照相，其他店铺也是生意萧条。老板这时也常守在店子里。街面上乱得很，可惜我不能出去看热闹，只能听三大爹和别人夸天，了解到一些情况——什么地方难民很多，没有吃的就集体抢东西吃；什么“吃光队”还有前线下来的伤兵老爷，耀武扬威，到处吃喝不给钱，拿着一根棍子，不是打东西就是要打人，口里总是带着“渣子”骂人：“老子在前方流血，为了谁？一死就是几十上百号人，你们晓得吗？看哪个敢跟老子作对，老子就打死他！”这时警察也好，宪兵也好，看到他们都自动退避，免得麻烦。许多店铺早早打烊关门，老板看这形势，也叫我天不黑就赶快把门关起来。老板很有心计，生意清淡，就将三个师傅清退了两个，说是回乡休假，等时局好转再请他们回来。到了5月初，街上的兵车多起来了，而且晚上也是运来运去，白天连警察都看不到了，宪兵也没了，只有少数义勇消防队的人在街上维持秩序。到了15日晚上，只听得整夜炮声不断，兵车来来往往，我一晚没睡。第二天一早，街上空荡荡的，只有少数人拿着小旗子在街上走动，我这才听说，“共产党进城了，尽是些土八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打得落花流水的。”

（四）

解放了！这一天是1949年5月16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老百姓可以过太平日子了，没有像过去国民党报纸说的什么共产党是“共产共妻”，个个长得“青面獠牙”……我所见到的解放军都很和气。有一次，几个年轻的解放军士兵要照相，态度很客气，与国民党当兵的完全不一样，搞得师傅不知所措，不知他们会不会付钱。照完后，他们马上问几多钱？什么时候能来拿？师傅说得三天后来取，那士兵们有点犯急了，说部队后天就要开拔，想在经过的大城市汉口留个纪念。我正在登记，便随口说了一句：“加快要收加快费！”他们高兴得连连说：“那好，那好。”吴师傅却说：“算了，就算普通照吧，你们明天早上来取。”那些士兵喜出望外，连声道谢，走时还与我们说再见。这件小事，我们一个传一个，大家都知道了，都说共产党的部队真的是不错。那段时间我特别注意看报纸，知道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有在汉口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没有大的会场，我们店隔壁的大舞台戏院经常有部队开大会，吉普车一来一大排，把友益街挤得满满的，有人说这是共产党的大人物在里面开会。

报纸上更多的消息是发展生产的情况，还有什么“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有时还登些读者来信，披露有些工厂打骂工人、虐待学徒工事件。我对此特别感兴趣，心想我也要翻身了。老板和三大爹对我的态度也稍好了一些。有时中午，姑太坐在大门口时，我就溜上楼看吴师傅修底片。修底片是个细活、技术活，要胆大心细，要在底片的毛面上用硬度铅笔，一笔笔地划、填，可能是搞

黑白或阴暗面吧。我只看过，没亲手干过，因为那不是新手能试的。每天晚上冲底片，那可是个辛苦活，虽然暗室内有电扇，但室内包得严严的，密不透风，房间又小，所以师傅一般不让我进去。洗相看来是个简单的活，把底片往暗箱上面一放，再拿相纸往上压着，根据底片的厚薄心里数秒，再放在显影水中显影，在红灯下观察显影程度，马上就拿起放到定影水中，约过一个小时再用清水漂，这就是我的事了。这活很累，前面已说过，有时我将家中的底片清出，与师傅说一下，自己试着动手搞一下，很有趣味。看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也难，真正要洗好一张相要不断地学和扎实地干，才能做到。后来有一件事我始终想不出来，大概是我做错了什么事，三大爹狠狠地训我，把我气得大哭起来了，连顾客来了我也不管，师傅都下楼来转弯，我还是不听。正好老板回店，把三大爹叫到旁边耳语几句，我也不敢哭了。过了几天，老板找我问话，意思是问我还想不想干下去，不想干就同我爸讲一下，想干就踏踏实实地干，有空就到楼上找师傅学学技术。我当然想干下去，不然我怎么回家，又听说让我学技术，我就说我还是留下来。

秋去冬来，街上的梧桐树叶直往下掉，天气有些寒冷起来。这时有一个好消息传来，三大爹叫我去参加市里组织的秧歌训练，在集家嘴附近，每天早上6点到场。我当然非常高兴，后来我打听到了，这是为了庆祝武汉解放后的第一个元旦，军管会和市政府组织全市大游行，并发动各行各业搞秧歌队。那时，照相行业同仁公会（老板们的组织）也搞了一支秧歌队，成员都是从各个照相馆抽出来的学徒，但里面没有女生，所以把我们长得清秀点的男孩充当女生，每天还补助我们过早的钱，那十多天我玩得真高兴。

后来，老板和三大爹、姑太尽管都对我客气多了，但我还是不想干下去了。我从小个性好动，每天坐几个钟头，实在难受。解放了，社会也安定了，每天报纸上的新花样都让我耳目一新，我还晓得了一些新名词，什么穷人要翻身、当家做主人，反对压迫、反对剥削，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等等，这些都让我感到无比新奇。我还是想回到学校里去，那里既能学习文化，又有同龄朋友好玩，于是我回家说要读书。这时，家里的生意也好了些，也同意我回家，而千秋照相馆的老板也没有留我的意思，这样我就高高兴兴地结束了我的学徒生涯，到了覃怀小学念五年级。后来，我还从这个学校出去参加了军。

（肖人杰：武汉电信局退休职工）

爱国学者徐行可与教坛名师刘凤章

◇ 刘松余

2016年，笔者应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邀约，编校荆楚文库丛书《刘凤章集》。在搜寻深藏和散落的相关资料中，发现爱国学者徐行可与教坛名师刘凤章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师生情谊。徐行可尊师重义，仁爱正直，为刘凤章的学术研究和著作撰写及时递送参考文献；在刘凤章遭遇危难的时刻，及时伸出有力援手；对刘凤章去世遗留的著述，徐行可像对待许多古籍一样，悉心地呵护和保存。未曾料到，这些都为现今出版荆楚文库丛书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爱国学者

徐行可（1890～1959年），名忠恕，字行可，常用恕，以字行，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人。据徐鲁记述：“幼年时代，徐恕从黄陂刘凤章先生学习时，就开始亲近典籍。1907年他17岁时赴日留学，次年为胞弟奔丧回国。”徐行可牢记好友、国学大

师黄侃之言：“当今国家，第一当保全匡郭；今日学术，第一当保全未来。”他受经史典籍的浸润熏陶，渐渐绝意于仕宦名利，专心以访书、购书、聚书、藏书为乐，倾其家财，旁采远搜，或专程走访，或辗转求至，长此以往，积累与日俱增，成为著名藏书家。徐行可节衣缩食，勤俭律己，爱书买书，读书校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凡金石考证、经史诸子、目录志略等，一义未安，遍查群籍，博引旁征，解难析疑，批校题跋，辑佚志注；在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方面积淀深厚功底，曾在武汉、北京的大学执教。他珍视典籍和文物，日寇入侵轰炸武汉时，不顾家人劝阻，为抢救武昌旧居藏书，冒着生死风险在长江摆渡，把书籍转运汉口租界存放，其惜书事迹感人肺腑，保护典籍贡献卓越。

徐行可思想开明，书肆为人，讲求应用，嘉惠学林。造访、借阅或得到徐氏提供典籍文献者，远近学者甚多，交往切磋成为密友

的有一大批知名人士，如杨守敬、胡适、黄季刚、王葆心、杨树达、余嘉锡、章炳麟、徐森玉、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沈祖荣等，达数十人。许多学者在研究或创作中，常常得助和受惠于徐氏藏书。此类事例众多，不胜枚举。他选取陆游《剑南诗稿》中“传家只为传书种”一语，专请篆刻名家治藏书印一枚，借此表述自己的情志，亦向后人传达了恳切的心声。他曾说：“不以货财遗子孙，古人之修德；书非货财，自当化私为公，归之国家。”20世纪50年代初，董必武副主席在京接见湖北知名人士，徐行可应邀与会时向董必武表达了捐献私藏的心意；回汉后又致信董必武，再次表达向国家捐藏的夙愿。

1956年，徐行可慷慨解囊，去私奉公，亲自将500箱6万册古籍藏书捐赠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该院受赠后，当时奖励他2万元。徐行可坦言：“我是捐书，不是卖书。”接着用这笔奖金在北京古籍书店购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631册，再次全部捐至中科院武汉分院。1959年，徐行可因病去世，他的子女遵其遗愿联名具函，将余藏200箱4万册古籍捐赠湖北省图书馆；同时将所藏宋元明清字书、画卷、册页、扇面、手札、楹联及金石拓片、铜镜、刀币、瓦当、封泥、印章、碑帖拓本等，共7700余件珍贵文物全部捐藏湖北省博物馆，内有相当多的赠品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该馆传世文物骨干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1年，中科院武汉分院受赠的徐氏藏书，悉数拨归湖北省图书馆。由此，徐氏捐赠的10万册古籍合藏于湖北省图书馆一处，并在全国文献普查时多定为研究级学科藏书，极具学术研究价值。其中，尤以明清善本、抄本、稿本、批校本极为罕见，清《春秀堂诗经真本》五卷、明万历刻本《黄鹤楼

集》更是罕见珍本，弥足宝贵，奠定了湖北省图书馆古籍特藏的重要基础。专家指出，徐氏的大量藏书属于我国最重要的、核心的中华元典，同时所藏湖北的地方文献甚丰；无论数量还是品质，徐氏的捐赠在全国私藏捐赠中位列前茅，在湖北文献史乃至全国文献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徐行可为学严谨、追求真知的科学精神，“化私为公”“资助治学”的奉献风格，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德”捐藏的爱国善举，为后世留下了堪为景仰传颂的功德佳话。徐行可的事迹值得人们铭记。

教坛名师

刘凤章（1865～1935年），字文卿，一字耘心，晚号岱樵，谱名华銑，湖北黄陂县滢口刘新集乡（今属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人。他于兄弟中排行居长，其父熟于宋儒之学，因世乱辍读，寄望长子纂切。“六岁即命入学”，后“以府县前茅入泮”，“乡试膺荐四次、堂备两次”。其间，刘凤章与徐惠卿思想默契，感情甚笃，徐惠卿在家设教馆，为培养后代延师，刘凤章的执教生涯由此起航。刘凤章回忆执教发端时说：“予馆徐惠卿家。徐君与予交最深，论天下大事辄合。”叶贤恩撰文叙及：“行可幼时师从黄陂籍刘凤章先生读私塾，敏而好学，四书、五经、史记等，都全通读，同时自学诸子百家许多典籍。”儿时的徐行可聪慧勤奋，备受老师刘凤章喜爱，师生心心相印，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清光绪末年，刘凤章在武昌多所学堂执教，任湖北学务公所副科长、科长，践行张之洞“废科举、办新学”的教育主张，管理海外留学等事务，鼓励徐行可留学深造。

民国初建，他被黎元洪副总统委以顾问，仍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任武昌中华大学校长、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湖北省立国学馆教授，主办武昌养正高等小学等。刘凤章借鉴中外办学经验，倡导知行合一，授课治校，“耘心”育人，“在清末民初，湖北教育界讲学，有极大影响”（余家菊：《五十回忆录》），“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教育家”（陈启天：《寄园回忆录》），被誉为“武汉文化教育界中的重镇”（徐复观：《五四运动的一个角落》）。他的“学生中多异才”，奋志求知，笃学力行，诸如徐行可、恽代英、余家菊、陈启天，以及蔡以忱、吴德峰、包惠僧、徐复观、周谦冲等，敬业精锐，卓有建树。亦有徐复观等撰文多篇，追忆他为人处世、享誉教坛的往事。

现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1923年由湖北一师毕业考入湖北国学馆深造，他1981年发表《忆念刘凤章先生》一文说：“近五十多年来常常想到我住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校长刘凤章先生，总感到真正以宋明儒讲学精神办学校的，民国以来仅有他一人。这在教育史上，在儒林传中，都应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又说：“宋明儒讲学的精神，或者可以三端来加以概括：第一，他们讲学的动机是来自继往开来的文化责任感。第二，他们所追求的是要能证验之于身心、证验之于社会的‘真知灼见’。第三，他们要培养出的是在人格上能担负得起人类命运的考验。刘先生所处时代不同，但用心未尝不是一致的。”

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陈启天，1915年武昌中华大学毕业留校中学部任教，著《寄园回忆录》中说：“大学教育的精神领导者，是学长刘文卿先生。”又说：“我国旧日分老师为两种：一是经师，二是人师，而以人

师最为人所推重。依我看来，刘先生可算是晚近的一个人师而兼经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刘先生的人格教育精神，为现在许多教育家所不能及。”

著名教育家余家菊，1918年从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后，与恽代英是大学附中同事，在《六三回忆录·人物志》中，首先写到刘凤章：“他是黄陂同乡，讲阳明之学，提倡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教书时以强烈的热情发挥他不平凡的意见，我受他很大的影响。”“在大学同班中有恽代英者，受刘先生的影响也不浅，提倡即知即行。”他在《疑是录》中还写道：“刘凤章文卿先生为大学学长，宣扬王阳明，时作国学讲演，予颇受影响，倾向研习国学。”“刘先生之作人启示”，是为在中华大学“三不可忘”的名师之一。

师生情谊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假借“筹一国之治安”之名，湖北的代理人发起劝进复辟，教育界也有阿谀追随者。刘凤章1914年就任湖北一师校长，翌年夏赴京参加全国师范会议，即闻袁有帝制自为之说。袁闭会时在怀仁堂盛礼宴请与会者，亲出演说。黎元洪嘱筹武昌养正小学事宜，亦召宴刘于瀛台，深叹袁误国图谋。刘先生后就此追述：“南下后，筹安之说甚嚣尘上，当局拟组织请愿团，派人讽予为发起人。予决此事发生，天下事必不可收拾，力拒之。后，教育会正副会长廉得此情，具书将军巡按愿为号召，将军巡按嘉其知大义。某会长知予不愿也，首以名册嘱师校副署，并举例云：一、署名；二、不自署名者，伊为代署；三、不肯署名，书明理由。咄咄逼人。自念生平奉一心为严

师，心所谓危，屈于威武而强从之，死何能瞑目也！因援笔书云：某月某日，大总统命令学界人员，不准干与政治。兹举涉政治范围，恪遵大总统命令，不敢署名。斯时，各校观望不前，唯予马首是瞻。教育会无如之何，乃电京师筹安会，谓予首反对。同人为予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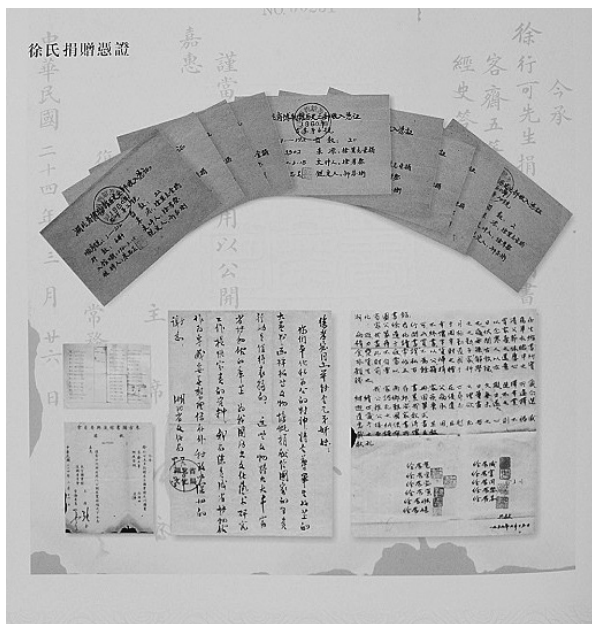
刘凤章不受利诱，不畏威逼，在湖北率先抵制，坚拒签名，宁为保卫民国而死，决不偷生开倒车去拥护复辟丑行。面对如此艰险时势，徐行可尊师重道，慰存相援，是年8月陪同刘先生赴山东曲阜祭孔。刘先生祭礼后登场讲经，讲周易大义，颇获衍圣公赞许。师生一起谒陵，一同北上泰安登泰山，“每遇胜迹均摄影，以志鸿爪。”刘凤章回鄂后，力辞校长之职，并在一师大礼堂召集全校师生开会，慷慨陈词，誓死反袁复辟，高呼：“为保卫民国计，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气势磅礴，忠爱共和，正气凛然，拂袖而去；师生哭泣，声震校园，列队送别校门。次年袁死，刘先生才被迎回学校视事。1921年刘先生离开一师，后屡有聘请出任官职之事，因厌恶争斗，均婉拒未就，继续受聘在几所大学和国学馆讲学授课。

1923年，湖北省创办国学馆，地址在武昌东厂口国立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校内。国学馆是湖北省政府出资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以“昌明国学、内存国性、外美国风，促文化之进行为宗旨”，履行教学、学术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责任。国学馆的学术研究责任分为本省和全国两种，对湖北自身的责任列有六项，对全国的责任列有两项：“一、编辑教科书暨讲义，以辅助教育界之进行。二、刊发国学杂志及演讲集，以普及国民尊重微言之思想。”刘凤章常说：

“《周易》非仅卜筮之书，实中华民族文化

与智慧的结晶。”他在湖北国学馆任教授时，“讲《周易》《毛诗》，编有《周易浅说》三卷。”1934年，他将数十年研究积累所得整理写成《周易集注》四卷。武汉大学国学馆学者撰文分析认为，这可以看成是湖北国学馆倡导履行全国国学责任“编辑教科书暨讲义”的一个成果。

徐行可尝言：“藏书非为一家之蓄，旨在资助治学者。”显见这位收藏大家的高远心境。据《湖北省图书馆藏徐氏捐赠古籍珍、善本选目》（不是全部），经部易类明清刻本有五六十种，涉及汉魏晋、唐宋明清人士作品。徐行可历来倾其所藏助力天下学人，作为刘先生的得意门生，对于恩师治学更是竭尽所能。刘凤章在《周易集注·自序》写道：“门人徐恕富藏书，知予雅好《易》也，有所得辄举以示予，前后不下数十百种。冥心搜讨，窃叹《易》之义理无穷。然皆出于象数，单辞只字，从无泛设。伊川之所言义理固精，然要为儒家之义理，不尽《周易》之义理也。壬戌岁，萧恒珊督军治鄂，创设



徐行可先生捐赠凭证

国学馆，延予讲授《周易》。予见治《易》者，言人人殊，恐学者之彷徨歧路，不得其门而入也，因集众说而成一家言，使学者畧识端倪，名之曰《周易集注》。”今在武汉、北京、上海的几所大学图书馆查询，均发现藏有民国年间在武昌印行的《周易集注》线装本。这是刘凤章的一部重要著作，台湾艺文印书馆以湖北省图书馆所藏旧籍复印件作底本，1982年在台北据徐复观等人校正重刊，刘先生侄女刘敦勤附撰《〈周易集注〉跋》说：

“《易经》一书，穷究万事变易之理，直探宇宙造化之源，论者谓为世界奇书之一，历伏羲、文王、孔子三圣发展而成；汉代以后，治《易》者代有其人，皆各有所见，要不出象数、义理两派。先伯著此书，博览有关《易经》之著述达百数十种，深思熟虑，取菁撷华，而以孔传为宗，还儒家易学之本来面目，其弘扬儒教，保存国粹，嘉惠后学，实非浅鲜。”《周易集注》被收入《刘凤章集》时，笔者发现湖北省图书馆藏有徐行可捐赠的完整旧籍，全书经徐氏校批，逐一朱笔示出，没有认真熟读全书及谙习其他数种文献的学问造诣，他是不可能做到的。所幸《荆楚文库》整理典籍，徐氏校批该书的成果被纳入《刘凤章集》相关《校记》之中。

1926年，湖北国学馆的创办和出资人突然去世。北伐军占领武昌后，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北伐军中有人视国学为消极力量。此时，刘凤章年逾花甲，处境严峻，生活窘迫；徐行可亦遇困境，仍悉心关照和帮助恩师，尽力排解生计之忧。徐行可的密友、当时在北师大授课的黄侃，1927年7月14日写《与刘静晦书》，信中说到：“行可遭际若是，闻之良为嗟叹！所愿其太夫人康健，其先业及藏书获保，斯则懿耳。”又说：“耘心先生近日兴居何以？居乡抑居城耶？

侃于吾乡诸老辈极不忘先生耳。四海皆秋，悲哉萧瑟，慎护玉体，共励岁寒。幸甚，幸甚！”刘先生后来忆叙当年：“以后遂蛰居僻壤，绝口不敢言天下事。庚午（1930年——笔者注）秋，徐生行可荐予馆四川苏君汰徐家，姚玉堂、黄师让子女附焉。越三年，毫无成效。乃在塾既虚糜钱谷，去塾复馈以多金。主人情厚，殊为可感。”他辞馆家居，潜心著述，晚年患疾返回故里，受族众拥载抱病续修宗谱，1935年病逝。

如今，在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图书馆，都可以查阅到刘凤章撰写的《东游纪略》。这是他1919年率团经沪赴日考察教育的报告，唯湖北省图书馆特藏旧籍中，附订有刘先生续修族谱时载录的《七十自叙》，除全文经徐行可点校朱批，还分别钤有“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图书馆藏”和“湖北省图书馆藏书”的馆藏红印，这也是徐氏捐赠私藏的流转标记。作为刘氏家族的后裔，搜寻家史，觅求族谱，笔者睹物思人，感慨万分。而徐行可保存和捐赠的是十多万件珍贵中华古籍和文物，对于民族、对于国家，功莫大焉！

（刘松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冶南方公司武汉钢铁设计研究总院退休；迁籍北京后，专注文史研究）

江城古桥面面观

◇ 李庆南

自古以来，武汉江河纵横、百湖密布，勤劳智慧的江城人在其上修建了数以百计精巧壮丽的桥梁，便利了交通，成为江城古代文明的标志之一。解析江城古桥，不仅是为了找回江城风韵，更是为了还原江城历史。

桥梁话古

武汉绝大多数古桥已消失无影，今存古桥仅数十座而已。武汉《城市建设志》统计：“清末，三镇共有桥 131 座，其中汉口有 67 座，汉阳有 25 座，武昌有 39 座。”武汉《交通邮电志》统计：“1985 年，市内古桥经改建仍保留使用的仅 23 座。”截至 2011 年 3 月公布的武汉市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古桥有：保寿桥、北洋桥、南桥、灵港桥、三多桥、孙家渡同善桥、狮子山三眼桥、沈家大湾石桥、张公桥、半河桥等。江城古桥大多建于明清时期，有记载的明清之前的古桥不多，存者更少。

江夏区金口镇五枫桥，可为江城有记载的最古之桥，也是江城存世最古之桥。《金

口镇志》载：“五枫桥位于杨蒋湖西畔，金口小学西南。始建于东汉，为红砂石券顶式石拱桥。全长约 10 米，宽约 3 米，高约 2.5 米，桥面两侧有望柱石栏，券顶部嵌长方形青麻石一块，上刻正楷‘五枫桥’三字，至今清晰可辨。相传赤壁之战时，为周瑜安营屯兵处。现年久失修，桥下湖泥淤塞，桥上建有民房，桥孔为古沟下水道入杨蒋湖出水口。”

武昌孟井桥，又称孟桥，始建于三国时期，今圯。民国《湖北通志·江夏县》载：“孟井桥，在城东北三十里，相传孟宗（三国时期吴国著名孝子）建，宋·王十朋有《暮宿孟井桥》诗。”

蔡甸区《索河镇志》载：“马城桥，又名仙人桥，亦名滔光桥，坐落在彭新集与汉川县城子头交界处。始建于三国时期，原为木板桥。清嘉庆年间，彭新集人、吏部主事彭守正捐资改建成石台石面单孔拱桥。桥身为单拱并联纵砌结构，均系青条石用糯米兼瓦灰粘结而成。桥长 30 米、宽 5 米、高 5 米，拱净跨 4 米。”马城桥现存完好。

同书载：“官桥，原为古桥，坐落在官桥村南冲，传为三国时关公（关羽）所建。清初……本邑人高德甫、胡铜匠捐资并主持将原木板桥改建为石台石面平桥。清末，又复建为长4.7米、宽4米的麻条石平桥。1969年，城蔡道复修，官桥便向北移建到李家集城蔡道20+127桩号处。”

《新洲县城关镇志》记载，新洲县（今为新洲区）城关镇（古为黄州治所，又称齐安郡、邾城、旧州）曾有三道古桥始建于三国至晋代时期：

中河桥，在附池北，今废矣。三国时吴建，它是新洲正街连接老城的古桥，横跨在附池上，东进龙凤门，西入正街。

海棠桥（亦称吴河桥），在故城东门，三国时吴建。（明）弘治《黄州府志》载：“古有此桥，在旧州，今废。”注：相传宋代诗人秦观曾在该桥石柱上题词，有句曰：“唤起一声人悄，衾冷梦寒窗晓，瘴雨过，海棠晴，春色又添多少。”

清安桥，原为古城东门朝宗门出城之吊桥。吴亡后，城属晋，改吊桥为固定石桥，明初，城基东移，桥遂废。

黄陂史上记载的古桥亦有多座：

西郊桥，建于北宋或之前，今废。同治《黄陂县志》记载：“西郊桥在县西城外二里许，今称程夫子桥……二程夫子（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本籍河南……生於陂邑（黄陂城关）西偏……白云洞、西郊桥、环水台，皆为二夫子游衍处。”

骆驼桥，南宋时已存在，今废。同治《黄陂县志》载：“骆驼桥，在县东二十里。”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骆驼桥在黄陂县东二十里，魏人来伐，以骆驼载輜重坠桥下，因以为名。”

黄陂潏水汊河上黄婆桥，建于北宋之

前。同治《黄陂县志》载：“黄婆桥在县西数百武（古代计量单位，每武为半步）。世传宋太祖（赵匡胤）微时过此，求水于黄婆，以酒进且曰酒禁严勿泄。（宋太祖）后即位，蠲合邑榷活（取消当地禁酒令）。”黄婆桥因以名，该桥在民国时尚存，宽8尺有余，单孔石拱桥。解放后，因城镇建设，该桥已埋入街道之下。

黄陂城关西郭外大小板石桥，始建于南宋。同治《黄陂县志》记载：“小板桥在西郭外，大板桥去小板桥五十武，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建，明永乐间重修，桥下石将军四石上有仙人足迹。”相传泥木祖师鲁班曾到此平水患，桥下石上留有其迹。1984年，黄陂城关镇扩建两板桥，原桥拆除。

汉阳迎春桥，北宋大观年间建。万历《汉阳府志》载：“迎春桥，在县治西一里，宋大观建，石上刻‘迎春’字。（明）赵弼诗：‘谁人垒石架长虹，江水流来汇泽通。绿野年年二三月，野花芳草总春风。’”清末河港淤塞后，此桥也圯。

武昌伏龙桥，始建年不详，南宋已存在，今废。（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鄂州》载：“伏龙桥在（武昌）城东南，普应庙（在武昌文昌门外）碑云：‘晋许旌阳（晋代道教净明派祖师许逊）自豫章逐蛟至此，蛟化为白驴伏桥下。’”康熙《湖广武昌府志》载：“伏龙桥，（武昌城东南）中和门内。晋许逊自豫章逐蛟至此，蛟化为白驴伏桥下。”

武昌广平桥为南宋绍兴年间建，今废。万历《湖广总志》载：“广平桥，（武昌）望山门外，绍兴间建。”（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鄂州》载：“广平桥在（武昌）望泽门（明代改称“望山门”）外，（绍兴年间）总领宋公瀚所建，故名，跨南湖通南草市，两傍有水阁。”南宋诗人陆游《入蜀记》载：

“二十七日，郡集于南楼……下瞰南湖，荷叶弥望。中为桥，曰‘广平’。其上皆列肆，两旁有水阁极佳。”

南桥位于江夏区贺站乡，始建于元至正九年(1349年)，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重修。南桥长36.7米，高10米，面宽6.3米，为砂石单孔石拱桥，净跨9.7米。拱圈底面刻有“至正九年己丑春夏南桥——力鼎”字样。此桥至今保存完好。

巧夺天工

自古以来，江城人筑桥，可谓集思广益、巧夺天工，其卓越的造桥技术为今人所折服。江城古桥建筑材料主要有木、砖、石料。木桥如六渡桥、广益桥等，砖桥如大官桥、长虹桥等，石桥如孔叹桥、保寿桥等。

从结构上来说，江城古桥大致有拱桥、梁桥、拱梁组合桥、堤梁组合桥、浮桥等类型。

拱桥基本类型有单拱、三拱、连续多拱石桥。

如，北洋桥又名白杨桥，位于洪山区和平乡北洋桥村东湖港上。北洋桥为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始建，为无墩单孔弧形石拱桥，石拱跨度为9.5米。桥身由砂石砌筑而成，桥面铺砌砖石，桥身加两端引桥，全长50米，远看如长虹饮涧，典雅壮观。北洋桥几度修葺，至今行人车辆仍可通行。

又如，狮子山三眼桥为清代三孔半弧形拱桥，位于江夏区纸坊街狮子山村宁港湖汊上，桥长36米，主要用青条石砌筑，间夹有少量的红砂石；桥面为拱形，中宽5.1米，两端面宽5.2米；中孔跨度4.3米，拱顶距水面2.8米；侧孔跨度3.2米，拱距水面2.5米。东西两端侧面各建有八字形挡水墙，桥墩两边各建有挡水墙柱，前端呈三角

形，起到分水进孔，减缓水流冲击桥墩的作用。该桥经修缮，至今仍可通行。

梁桥，古称平桥，结构简单，外形平直，比较容易建造。

如，石潭泾古石桥，位于东西湖区径河街的径河上，为江城最长的石梁古桥，明崇祯二年(1629年)始建，清雍正二年(1724年)汉阳县丰乐里人、徽州同知张叔珽重建。该桥长98丈，高1丈5尺，宽1丈2尺。正桥用红砂石建造，其引桥延伸3至4华里。正桥有3孔，正孔能通航九舱以上大桅杆帆船。据载，张叔珽重建此桥，在铺设桥板时，因桥墩跨度大而且很高，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法将沉重的石条从河面举上去。张叔珽受三国时曹冲称象故事的启发，令工匠借助汛期水涨船高的规律，将桥面石条抬上去。民国初该桥尚存，后毁。

拱梁组合桥，如，明末始建的黄陂区罗汉寺街龙须河上半河桥，桥全长61米，宽4.5米，高4米左右。桥身用青石筑建。桥身分成东、中、西3段，桥有5孔，其中拱形孔3个，拱跨4.5米左右；长方形孔2个，孔宽2米左右。该桥兼有拱券式和石墩梁桥式两种结构，桥面呈“Z”形，好像两座半截桥在河中搭接而成，故名“半河桥”。

堤梁组合桥，指在江湖之上梁桥落坡处设堤直接与岸相连。如，雍正二年(1724年)，汉阳知府郭朝祚在汉阳月湖中段筑堤，史称郭公堤，堤长245丈，中间建3孔石梁桥，东西月湖水可在桥下贯通。桥两边落坡处设堤与岸相连，将月湖分为东西两半，成为一条重要的交通通道。今桥已废。

浮桥，指在江河之上用船或浮箱、巨木代替桥墩，上铺木板建成的浮桥。

明代武昌望山门外里河(今巡司河)口曾建浮桥。同治《江夏县志》载：“浮桥

在望山门外里河口，为金沙洲要路，明弘治五年（1492年）知府冒政造舟为梁。正德庚辰（1520年）周仪改造。嘉靖壬子（1552年）知府严中增修。”此桥几经改建，今已不存。

160多年前，太平军建成的连接武汉三镇的浮桥最为著名。1852年12月22日，太平军攻取汉阳。随后于24日，以铁索系船在江上搭起两座浮桥：一座从汉阳南岸嘴到武昌大堤口，一座从汉阳鹦鹉洲到武昌白沙洲。五天后，又在汉阳赫山搭起一座通往汉口的浮桥。这三座桥第一次将武汉三镇连成一体。有了这三座桥，太平军很快攻克了汉口、武昌。据（清）陈徽言《武昌纪事》记载，为使军队尽快过江，太平军于次年1月16日，从汉阳晴川阁下再搭一座更大的浮桥通向武昌汉阳门，这座桥不再是舟桥，而是“以巨缆缚大木，上覆板障”而成的大浮桥，其桥“人马来往，履如坦途”，后大风一度吹断浮桥，为防风浪，“复缚木为桥，更多系大铁锚，重三四千者，抛江中，视前益稳重，虽大风浪不能动。”这4座浮桥，有2座位置与今武汉长江大桥和白沙洲大桥吻合，有1座位置与今汉水铁路桥相吻合。以当时的观测条件，能在极短时间内选定这样好的桥位，足以证明当时架桥工匠的高超技术。太平军撤离武汉时，为使浮桥不为敌利用，“即传令焚浮桥”。

功能各异

许多古桥除可通行人马外，还有各自的功能，如闸桥、廊亭桥、关隘桥等。这一座座结构奇特、功能各异的桥梁既凸显着荆楚风韵，又讲述着江城的非凡往事。

闸桥除在河道上控制水位高低及河水流量外，在其上建造路桥还可便利交通。如，

清同治《江夏县志》记载，武昌保安门外跨越巡司河的新桥为明辽东经略、江夏人熊廷弼捐资倡建的闸桥，又称熊公桥。始建时置石墩两座于河中，首尾尖端，“如梳形，阔三丈许”，利于分水，“引汤逊湖、南湖、黄家湖、青林湖诸水以入江”。石墩与两岸石砌桥台相夹，“墩上有槽，水泛两旁以木板为闸，中筑土以障江水湖田焉。”

位于武昌八铺街巡司河上的武泰闸，由晚清鄂督张之洞主持，始建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为3孔石拱闸桥，闸长30米，以排泄武金堤内洪水，防止汛期江水倒灌；闸顶为路桥，宽7米，可通车马行人。2008年3月，武泰闸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桥上建造廊、亭、楼、阁等，集交通、游览、遮阳避雨功能于一身，是江城古桥建筑的一大特色。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总督额伦特在武昌巡司河重修明代新桥，名“额公桥”。该桥为石墩木桥身，桥面建木廊，廊顶布瓦覆盖，两侧有木栏，旁置条凳，供人休憩。1954年武汉汛期，该桥木廊半露在水面，妨碍水路运输，木廊遂被拆除。

江城还有许多亭桥，亭是由柱子支撑屋顶建造的单体木结构建筑，有的设有茶室，可供行人休憩饮茶，坐观风景。如，乾隆《汉阳府志》载：“高公桥在（汉阳）杨柳堤，上有凉亭。雍正十年（1732年），知府高纲并绅士甘昌祺捐建。”又如，同治《江夏县志》载：“杨桥在县东六十里，有亭……狮子桥在县南七十里，有亭……金锁桥在修贤二里，程云柄独修，有亭……瓦庄桥在修贤里，程联槐、联松、联彬创建，又筑茶室三间、凉亭一座，施茶汤以便行旅。”《大清一统志》载：“太平桥在江夏县南六十里，有亭。”

关隘桥除具交通作用外，主要有设卡戍守功能。

江城古桥唯一具有戍守功能的关隘桥是汉阳永安桥，又称西门桥。乾隆《汉阳府志》载：“西关，在西城外三里永安桥上。”汉阳西门外2至3里左右，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护城河，名曰西城壕。明成化三年（1467年），官府在此建单拱麻石桥，名永安桥，并在桥上设有防务关卡，谓之西关，又称西门桥。桥的两端地势低，平时桥拱最高处距水面两丈余。康熙《汉阳府志》载：“永安桥即西门桥，在县西二里，成化三年通判石磐修，弘治年间重修。”建国后西门桥拆除不存。

街桥大观

明代汉口镇形成之初，汛期江湖水涨，市民常遭淹浸之苦。明崇祯八年（1635年），汉阳通判袁焜主持修筑袁公堤，以防后湖泛滥，后发展成堤街，即今长堤街。（清）范锴《汉口丛谈》载：“堤街则自上关（宗关）起，直至大智坊之堤口（黄陂街下段东堤口）……堤街之后，夹以小河（因筑堤取土，挖出的沿堤壕沟），名玉带河，夏秋水涨，可通舴舺，今半淤塞，未能直行，而上下多有木桥（后来有建石桥）以渡，犹如故也。过桥，俗呼为堤外，昔时荒沙一片，嗣则居民丛聚，渐成街市。”这些横跨河湖木桥被称之为街桥，主要集中在长约10里、宽2丈的玉带河及堤内湖塘上，或相距里许，或半里许。民国徐焕斗《汉口小志》载：汉口“桥梁之可考以居仁坊宏膺桥建筑为最早，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邑人李衍广初建木桥，以通往来二十六年，贡生李国柱更筑以石，上加石栏，行人称便。嗣后邑人

刘建瑜于由义坊建喻义桥。而循礼坊之九如桥，后湖港上之万寿桥、陆（六）渡桥、广义桥、新盛桥亦先后建筑，其余若燕山桥、多福桥……等桥名尚多，无从稽考。”这些桥取名大致有七类：一依附近的梵字、会馆公所而名之，如宝林（庵）桥、指月（宫）桥、永清（会馆）桥等；二以吉祥多福褒义词而命名，如长寿桥、多福桥等；三以桥所在地命名，如大桥（口）、通津桥（在堤口）、出江木桥等；四以桥结构而命名，如瓦桥、石桥、板子桥等；五以建桥者姓氏称其名，如夏家桥、燕家桥等；六以有关神仙、帝王及名人取名，如玉皇桥、太清桥、御驾桥、青莲桥等；七取名寓意典雅，如天都庵前卧龙桥，桥上西有“卧龙潜渡”，东有“黄海飞虹”各四字，邑人戏称状元桥，除此还有飞虹桥、玉虹桥等。

据武汉《城市建设志》统计，清代汉口玉带河上有桥梁37座，堤内湖塘上有12座。街桥古朴浑厚多姿彩，小桥流水美如画，构成了老汉口的一大奇观。清同治三年（1864年），汉口堡修筑后，玉带河逐渐干涸至消失，街桥几尽废圯，仅存保寿桥于今。今有名存而迹已湮之街桥，绝大部分渐成巷道地名，有的还引申作为附近地片的泛称，如因六度庵而名的六度桥，即今六渡桥所在地，曾是花红柳绿、风光绚丽的后湖。嘉庆年间文人范涛有诗云：“妾似垂丝牵不断，郎如飞絮任斜飘。人都说是伤心树，怕上春风六度桥。”其桥今之地段，商铺林立，车水人潮，其名已成地片泛称。

（李庆南：晴川阁管理处副研究馆员）

江夏龙泉山名人印记

◇ 涂明星

龙泉山，古称夹山、江夏山、灵泉山，历来奉为仙居福地。自汉以来，有诸侯藩王、士宦文人，或在此土生土长，或慕名迁居到此，或来此游历观光，或卒葬于此，以不同形式留下印记，现将见于经传的人物印记梳理如下。

西汉开国元勋樊哙随刘邦打天下，封舞阳侯，谥“武侯”。后裔樊建迁其冢到龙泉山天马峰南麓“五龙奉圣”之地。明弘治贡监沈世昌《地理闲评》载：稍后汉代楚夷王刘郢客为父楚元王卜葬，见有樊哙墓在此，“吁嗟不忍葬”而放弃；元代藩镇武昌的威顺王宽彻普化相中此地，欲逝后葬于此，见宋理宗诏建张家“忠孝”牌楼在此而罢葬。到了明代，楚昭王朱桢看中此地风水，楚庄王将樊墓迁至靠近昭园东门。《江夏县志》载：楚庄王夺其地葬昭王，“凿之才洞其竈，云滃然出，至半空现（樊）哙身。王拜，祝以王礼。”明初可见“汉将军樊侯之墓”石碑，高8尺“舞阳侯”石台不知去向，现有樊侯墓碑和塑像为景区管理处制作。

汉末，勘舆大师朱桃仙勘地至此，见

两组峰丛环抱一座小山，恰似“二龙戏珠”，感叹此乃吉地。在玉屏峰东麓有太师椅状象形地，看到獬豸状巨石下有汨汨流动的涌泉，丢下一句神秘兮兮的话：“此灵泉也，不可凿，凿之则雷雨至。”此次勘地为龙泉山传奇的演绎埋下伏笔，也引得很多知情人追慕而至。从汉到明，相继有56个家族迁居到山内居住。

唐中期，江夏李氏入住山内，相继出现以书法、政绩闻名的人物。天宝末，中书舍人李暄与堂弟李洞避难逃到玉屏峰东麓山坳。李暄平地建房，凿出“灵泉”，方知朱桃仙所言极是。人们发现灵泉有求雨灵验、沏茶愈疾的效应，越传越神奇，“江夏山”由此更名“灵泉山”。李洞以宅为寺，首创灵泉寺，成为当地建寺最早、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寺院。李家住址迁至玉屏峰北坪。暄之子李酈，年少因服侍生病的母亲而闻名，唐肃宗敕建“蓼莪堂”，表彰其孝顺。“蓼莪堂”作为李氏宗祠，保存到明朝中期。皇上任命他当宰相，他婉言谢辞。逝后获赠太子太保，谥“肃”。李暄、李酈逝后葬九峰山。

酈之孙李璣，文才超群，著作等身。他与儿子李沆在玉屏峰北坪建造的“万卷书楼”，名震朝野，成为武汉地区最早的一批私人图书馆，遗址至今尚存。他两度被授任宰相，遭嫉歿于权争。逝后谥“文”，归葬江夏“灵泉山东数里胡宅后”（今龙泉新胡村）。李沆葬祖屋后山，明楚靖王寝西。其屋前的河道称作“沆子澚”。李暄有诗《灵泉山夜》：“山静云生石，水清月满川。”李洞《闲闲亭》记录他常见白云“时时出没万峰头”。李璣有《灵泉记》，描述李暄凿泉经过，以及“灵泉”的神奇现象；李沆《灵泉寺》云：“静夜清泉月，深山古寺钟。”无华丽辞藻，却意境深奥。

宋初，李璣后人李无怀执掌灵泉寺。熙宁三年（1070年），宋神宗召其入京，拜为国僧，赐其寺名为“龙泉广德禅寺”，标志灵泉寺名声达到顶峰。因而灵泉寺又通称“龙泉寺”。

北宋大臣冯京有三元及第、获赠司徒的荣耀。冯家住基在天马峰东麓的“山阳居”，屋前有“冯家澚”。冯家因故于景祐年迁居咸宁。湖北咸宁《冯氏宗谱》收有冯京《永丰驿读书台记》和龙泉乡绅、明初吏部官张添祐《坏墙记》。冯京自述：“京少从外傅于灵泉寺。余年十五，与先人去江夏而寓（咸宁）永丰，非择而取之也。”《坏墙记》描述冯京三修旧屋情形。有误传冯京墓在龙泉山，1979年考古发现冯京夫妇合葬墓在河南密县五虎庙，在此予以匡正。冯家外迁，杜家买下“冯家澚”。杜淦从“冯家澚”耕读起家，不耻务农，日耕夜读，由农夫一跃成为名人，被历代德育读物奉为勤劳致富典范。杜淦葬“仙人捧桃”之地，在玉屏峰东坪。

宋张栋与金兵激战，夫妻双双捐躯。儿子张芸舆逃难至此，挖地得金数坛，买荒

田300亩，在天马峰南坪营建含山楼，搭建茅屋60间，排列如市，出租作为商铺。灵泉商市，从此由山外湖边移到山内，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

元末，荆门知州聂炳携友刘惟谦（洪武初任刑部尚书）、田大圭（洪武年举县丞）同游龙泉山，写有《夹山记》：“登丰禾（今凤凰山）之巔，西望六老诸峰。”中秋月夜登玉屏峰，“俯瞰其下，万家烟火，真不愧为君子乡。”

元末，灵泉寺有安坛（张瑛）、太清（李元明）两位长老，安坛有诗云：“度世宁逃世，忘家当出家”，表达逍遥豁达的处世观。太清至洪武初年满百岁，仍然童颜如初，实属异相。两长老示寂后分别葬于逍遥塔和延寿塔。张养浩曾搭救麻城人邹普胜，当红巾军围攻江夏之时，作为军师的邹普胜派人将张家一家老小送至江西饶州避难，以报当年救助之恩。当张诚带领家人返回老家，看到满目苍凉、枯骨遍野的景象时，才真正感受到躲过一劫。

明初，张、曾、辜、沈、李、杜、樊、邹形成“灵泉八大家”。张诚、曾泰、辜皋在元末“僻居岩谷”。洪武五年（1372年），他们作为蕲州康茂才荐举的“江夏三贤”到南京应考，均被录用。

张诚20岁举为孝廉，在万卷书楼讲《易经》。应试及第后留任京师，洪武末病逝，葬骆驼山“骆驼卸宝”处，“今庄寝附之”。其子添祐7岁能文，号称“神童”。26岁中进士，历官詹事府、吏部。因父逝回家守孝，适逢朱棣发动兵变夺得帝位，补阙无着落，闲居26年。洪熙和宣德年两度奉诏入京，在“废旧立新皇后之争”中，得罪皇帝被劝归田，在龙泉山终老，其墓在昭寝之西。添祐之子张恒，“以父荫太学生，授南昌府尹。”

《灵泉石桥坊》诗载入乾隆《江夏县志》。张弘，曾任职山东青州安东卫，有“灵泉四宝”：一是镌有“状元张栋”的家传砚盘，有注水变绿的特性；二是高3尺、好似宇宙穹庐的奇石；三是刻有“江夏王（李）道宗制”字样的铜鼎，明初归王玘拥有，后被张弘购得；四是20担古书。张璞历任归安知县、监察御史，他正直严明，遭到镇守太监同党的报复陷害，被拷打身亡狱中。嘉靖初，世宗赐祭归葬天马峰南麓，今楚昭莹园东。《明史》《湖广通志》《江夏县志》均有其传。熊廷弼称赞其“扳逆鳞而不忌，忤权贵而不畏”。弘治年，楚王朱均鉞到龙泉就换地与八家谈判，被张通领衔的八家联盟拒绝后，上疏诬称八家谋杀楚王。皇帝信以为真，准备派御林军剿灭龙泉山，后经大臣劝说才中止。朱荣减继任楚王，加快夺地进度。张通义愤之下，上书楚王，直言：若大王不畏天道，本人决不卖家而屈服大王。倘若大王孤注一掷，本人生杀只有一条命。

曾泰早年闭守“玉书楼”读书，舒王塆今存菩树（即婆婆树）为曾母所栽。曾家建有别墅，村前有曾泰“圣主知名”牌楼和曾泰儿媳陈氏贞节牌坊。洪武十五年（1382年），曾泰升户部尚书，得赐金罗衣。其家族相继有人取得功名，如其族弟曾敬官至四川督学，玄孙曾仲贤为正统年贡监，曾守礼万历年任通判，恩贡曾铤崇祯年升岐山县令。

辜皋担任江西德兴县令。《德兴县志》云：“辜皋，江夏人，洪武初令。”《大明一统志》《江夏县志》记述他“招抚流亡，聚民保乡，奏罢开山炼铜，备建学宫桥梁。百里鸡犬相闻”。《灵泉志》记明太祖赐其姓董，后人董礼为永乐举人，董珍、董琰为正统贡监。

江夏李氏在明代有李时亮为洪武举人，

李磴为楚昭王仪宾，李元善、李巽为建文举人，李友文为永乐举人。李家修缮万卷书楼，曾泰撰文祝贺：“余愿拜手昌言，以贺其成。”正德八年（1513年）湖广乡试，李珍、李璋、李粹然兄弟三人同榜中举，声震湖广，一时传为佳话。

杜宗晦为永乐进士，官至布政使，作品有《祭户部曾泰先生墓文》和《赋役之苦论》。他认为曾泰起于草莽，能做到尚书职位，“千百一两人耳”；赋役之苦源于机构繁冗、税目杂多，官府仍在不断加赋增役，百姓苦不堪言。后人有永乐举人杜胜宗，任知府；景泰举人杜竑，官至河南左参政。

元末大学士沈如筠，与蒙元贵族貌合心离，选择挂冠归隐，定居龙泉山，广结人缘，出资建造秋风亭，洪武初置义田400亩赈济贫民。写有大量诗文，代表作有灵泉六景：《含山楼》《瑞芝堂》《春露亭》《秋风亭》《听松阁》《寻乐斋》。卒葬楚昭园稜恩殿东侧，已失其处。沈氏后裔有沈世昌、沈贲。沈世昌，针对楚王夺地，上书楚王，斥责其“干出不仁、不义、无礼、不智、不信之事”，若一意孤行，必遭掘冢、暴尸下场。其《地理闲评》，记录九峰山、龙泉山、梁子湖一带的名人遗迹，多为《江夏县志》引用。沈贲出任雷州府同知，常与诸友赏景作诗，有《灵泉桃园》《酬春露亭饮》等诗作，著《退田集》，劝诫世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成为俭朴持家、廉洁为官的代表。

明代樊氏科甲人物有樊时中、樊镛，分别为洪武、景泰举人，樊鉴为宣德贡监。樊时中《灵泉八家记》说：“灵泉里居，有数可美”，自然人文景观兼具，因此“学士大夫好奇游览者，往往流连盘桓于此”。樊镛《灵泉山记》记录了灵泉商市繁盛、祥和景象：明初“五十余年比宋元更有加焉”。

邹衍泗随楚王朱桢分封来武昌，后世定居龙泉山。邹彦魁曾就读于灵泉寺所设书院，中天顺举人，后任职于太常寺。其门联“绛帐青毡木铎声中挟士气，乌纱白发碧桃花里醉春风”，宣示其甘为人梯、蜡炬的精神。有《勉人力学》六则，诫勉子弟勤学上进。邹继鲁曾与何炯等人在宝峰寺结拜为兄弟，邹继鲁后为楚府仪宾，何炯任吴县县令时，唐伯虎为他作画题诗。邹彦魁、邹继鲁列为“灵泉八达名宦”。

“傅仙子”被楚王朱桢请到龙泉山卜地，吹捧此地风水如何保其子孙后代延年享福，朱桢更加坚定了放弃九峰山、强占龙泉山的决心。山东籍风水师王化龙，宣称这是上好宝地，其《赞灵泉山风水》说：“惟有吉人获吉地，三环水绕福绵绵。”并诡称“樊吟暂借楚王墓地，理当奉还。”为楚藩迁移樊墓编造借口。楚端王朱荣渼正德年为母卜葬，“山人相土指牛眠”，寻得一块牛眠吉地。可见楚藩对于龙泉山“宝地”达到痴迷执着的程度。楚府长史管时敏，陪同朱桢勘地，留有“千年胜地龙泉涌，一日佳城凤穴开”的诗句。他的儿子楚府纪善管延枝为楚昭王、楚庄王神道碑篆额，另一位纪善马纯书丹。楚端王神道碑由礼部侍郎崔桐撰文，书画师黄怀季书丹。三方碑文至今清晰可见，是研究明楚藩王的金石文献。

明中期以后，仅有少数官员经过特许方能进入龙泉山，因此鲜见文学作品。华容人天顺元年状元黎淳《游灵泉寺》云：“绿水苍烟近，白云古寺封。出门三五步，处处有高峰。”寥寥四句道出古灵泉寺幽僻的自然环境。石首籍大学士张璧，嘉靖年奉旨踏勘，在灵泉寺壁题诗一首《游灵泉山》：“南北高峰耸碧天，山头灵处有灵泉。云深萧寺无人见，笑傲烟霞自在仙。”江夏举人张凤

翼《游灵泉山》有云：“共上灵泉绝顶望，苍烟绿水碧云天。”《万卷楼》一诗追远怀古，睹物思人，抒发对于万卷书楼的无限怀念之情。

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熊廷弼，与龙泉张家有姻亲关系，以“龙”“泉”为首字的楹联“龙峰层层九重潜龙圣地，泉水淙淙三曲灵泉仙乡”，对仗工整，意境高妙。他同情“灵泉八家”，痛恨楚藩。从爷爷辈开始，熊家便惨遭楚藩折磨。熊翁拒绝与楚王朱显榕合谋诬陷他人，便因“莫须有”罪名遭受牢狱之灾，熊家由此衰落。熊廷弼在亲戚资助下得以继续读书，科考入仕后，与楚藩势不两立，曾率领江夏士绅祭奠御史张璞。张家力抗楚藩夺地，楚藩因此撤销张诚乡贤祀牌位，从县志中除名。熊廷弼公开挑战楚藩，专程致信江夏县令徐日久，要求恢复张诚应有名分，欣然为楚藩正在查禁的《灵泉志》作序，大加赞赏《灵泉志》的文学成就：“泣风雨，惊鬼神，方将驾唐宋而上之。”

明代龙泉山，见于经传的节妇、孝女、才女有10余人。《明太祖实录》载：曾泰长子曾养吾歿于兵战，儿媳陈氏“守节不贰”，朝廷敕建牌坊，为洪武十二年（1379年）全国旌表的9名节妇之一。乾隆《江夏县志》和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均有张学悟妻女的记录。一是“士人张学悟妻沈氏”，百般调护因苦读致疾的张学悟。学悟去世，妾陈氏生有一对龙凤胎。沈氏视为己出，两人共同抚孤成人。二是“张孝女少姑”，即陈氏孪生双胞胎之一，17岁有人上门求亲，母亲意欲答应，少姑哭着说：“恨父死未识面，愿侍母终老，弗忍离。”终身未嫁。母亲去世时痛哭10天，气尽而卒。不少女子写诗抒情，喜怒哀乐，皆由诗表。张弘夫人李季嫔有《听莺》，举人张祥夫人沈碧柳有

《悼忘》，御史张璞夫人朱玉淑有《回惜花诗于夫》《和夫张璞》，朱灵瑞有《勉夫》，张玉婵有《题燕》《解燕》《贺族兄登科》《观世有感》4首，张玉枝有《雨中鹃声》，张玉霄、张玉藻有同题诗《挽姐槎云》，张含英有《秋夜雨》，她们以封建时代女性的视角，记录世间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成为龙泉山文化的一道风景线。

楚王强占了龙泉山，相继建造9座茕园。明末，张献忠起义军沿途仇杀朱姓皇族，在武昌溺死楚王朱华奎，诛杀楚王宗室，继而开赴龙泉山掘寝搜宝，摧毁茕垣。有士兵被药箭射伤，以为是灵泉寺僧人所为，当夜将僧人沉水，仅有宁训（法名敬心）幸免逃脱。宁训在清初到武昌招募寺僧，让灵泉寺得以复苏，成为该寺一代住持。

明代有3名鄂州籍士人值得一提。其一是工部侍郎刘仲廉，为张诚学弟。张诚去世，刘仲廉撰有悼文《孝廉先生传》。其二是孙熙（正统年汝宁推官），查访论证“江夏山”名称来由。他说，武昌府、江夏县高山大山多不胜数，为何唯独龙泉山被冠以“江夏”二字？于是寻访耆老，有人告知：“此山为武侯樊哙所封地，家世居此，故冠以江夏。”此说提供三点启示：一是“江夏山”之名来自于江夏郡，而非江夏县；二是“江夏山”之名从汉设置江夏郡后便有了；三是汉舞阳侯食邑涉及现今江夏、鄂州一带。其三是张钟灵，虽在湖广乡试中荣获第一，但终未谋得一官半职，后移居江夏，以教书为业。与龙泉当地文士来往甚密，加上与龙泉张家有亲戚关系，受楚王府邀约作为换地的调解人，当他发现楚王夺地得寸进尺的野心后，便回复楚王：“大王若不另择他地，本人就放弃这份差事。”

清代来此游历的文士渐次增多，留下

记述或诗作的有：清初诗人、书画家叶封《慕庐集》记：“龙泉寺内有宋淳熙、元至正两钟。”看到楚王茕园仅剩残垣断壁，不禁感叹：“一代兴亡地，荒榛灭寝宫。岫烟萦野兽，泉音激悲风。”康熙年翰林院学士陈大章有《灵泉茕》诗：“石马秋摧金碗出，野狐朝上碧蕙啼。”乾隆年江夏举人曹文藻，看到9座茕园仅有昭园保存完好，却仍然“故物龟趺生石发，于今樵牧到荒亭”，感慨楚藩当年骄横一时，最后终归尘土，“只有高峰终不改，飞泉犹似旧时灵”。江夏贡士潘国祚《登龙泉山》云：“林尽陟危巔，旷然见天宇。山根片云生，村西一日雨。”一改前人悲惋沉郁的笔调，抒发登高望远、旷达舒展的心情。

清代中期江夏秀才汤铭新，少时陪同老表刘冀桂（后中乾隆丙午举人）来此游览。见楚昭王茕园中的建筑物“榱桷崇隆”，灵泉寺“法相庄严，别有洞天”，听说有《灵泉古志》，记载龙泉山人文繁盛的情形，决意寻找此书。历经嘉庆、道光两朝20余年，终于找到两个版本的古志，与弟汤又新整理编录，详加考订评释，著就《灵泉志》，收录诗文579首（篇），作者大多是龙泉山当地人，也有来访游历的亲友、官员。序中感叹“人情怀报复，天道力难支。寄语藩楚者，堪笑愚与痴。”此书作为孤本，藏于湖北省图书馆，成为研究龙泉山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

历代士宦文人在龙泉山，或居住、或生活、或游历、或安葬，他们增添了龙泉山地域文化的看点；他们留下的诗文书画，丰富了龙泉山历史文化的积淀。

（涂明星：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副教授）